

目 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2
引 言	4
第一章 生态美学与生态小说	8
第一节 生态美学的缘起	8
第二节 新世纪生态小说	15
第二章 生态小说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22
第一节 自然取向	22
第二节 末世情怀	31
第三节 生态理想	37
第三章 对小说中生态美学思想的评价	41
第一节 小说中生态美学思想的价值	41
第二节 小说中生态美学思想的不足	44
结 语	49
参考文献	51
致 谢	56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获奖情况	57
扬州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	58

中文摘要



20世纪,随着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以过度消耗自然来换取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不断提升。作为置换的代价,人类也承受着“温室效应”、全球变暖、酸雨、泥石流、核污染、沙尘暴、雾霾等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伴随这一危机的还有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生态危机与社会生态危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掀起了关注生态问题的热潮。20世纪末,中国也加入这一潮流,在人文科学领域,生态文学、生态美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都在为保护生态,重建人类美好家园而努力。

新世纪开始,生态小说的创作实践和生态美学的理论研究因其对现实问题有明显的介入性、反思性、批判性而备受关注。本文针对这一关注热点,拟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生态小说中体现的生态美学思想,来加深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造成的生态危机的认识,从而希望人们树立起一种人与自然、自我、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共生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论文主要分三个部分:

第一章,首先介绍生态美学的缘起,包括对生态美学含义的界定和对生态美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分析;其次,从新世纪前后的生态小说不同处着手,梳理了中国新世纪生态小说的发展轨迹。

第二章,主要从生态小说热衷于对灵性自然的叙事、对现实末日式的批判、对未来和谐生态理想的表达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了生态美学思想在新世纪生态小说文本中的表现形态。

第三章,探讨了新世纪生态小说中生态美学思想的价值和不足。其价值主要表现在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弘扬和对当下生存困境的启示,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对生态危机的根源探究不充分和表达生态美学思想的方式雷同化两个方面。

关键词: 新世纪;生态小说;生态美学;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

Abstract

In the 20th century, as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presses forward, the speed of human's consumption of nature in exchange for economic progress has increased. As a negative side-effect of this exchange, humans bore the "greenhouse effect." Due to this prominent issue, there has been a juxtaposed escalation in global warming, acid rain, mudslides, nuclear pollution, dust storms, fog and haze. With the problems,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s also brought ecological crises of mankind's spirit and society. From these troubles spurred a movement that brought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problems.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a joined this movement and began discussing ecological issues in the academic fields of human sciences, literature, aesthetics, philosophy, and ethics, among other things. Soon, all academia was working hard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build humanity's enchanting home.

Come the dawn of the new century, much attention was brought to ecological topics due to the wide array of published novels. These publications were very critical of some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urged human intervention in some aspects of the human-made ecological degradation. This author's writing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which can deepen a reader's knowledge about ecological crises caused by anthropocentrism. Also, the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of ecological holism that would create a harmonious and equal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beings, nature and society.

The thesis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origi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at field. Then it follows its developmental track, from the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century to the foundational ecological novels of China.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the three main aspects of China's ecological movemen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first is the ecological novels that are keen on the narrative of 'spiritual nature.' The second is the doomsday critique of reality. The third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idealistic world involving ecological harmony.

The third and final chapter discusses the both the benefits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thoughts in the new century ecological novels. The benefi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are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current plight of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The shortcomings are mainly in the roots of the ecological crises which have not been fully studied and the ways of expressing ecologically aesthetic thoughts which are very similar is their ideas.

Key words: new century ; ecological novels;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thropocentric; ecological holism

引 言

一、本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由落后的农业时代进入快速发展的工业时代。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成就让人类“做大自然的主人”不再是梦想，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逐渐逼近自然界的各种极限，于是，社会不再有对自然的崇拜与畏惧，科学理性成为时代发展的主导。人们对能够征服自然而欢欣鼓舞，尽情地陶醉在用自然置换的高速经济发展之中。

其实，对改造环境能力盲目自信的人们，恩格斯早就作出了预警：“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温室效应”、全球变暖、酸雨、泥石流、核污染、沙尘暴、雾霾等一系列人与自然的冲突威胁着人类生存的家园。并且，不仅仅于此，接踵而至的还有人自身的矛盾危机（如各种畸形心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危机（如民族冲突、经济冲突、文化冲突）。对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开始对各种危机警醒，开始对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与批判，并重新认识自然对人类的重要价值。因此，用于研究生物与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生态学得到了人们重视。

很多人意识到生态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具有前瞻性，因此很多其他学科领域都借鉴了生态学的思想，出现了诸如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伦理学等一系列的分支或交叉学科。生态问题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引发了西方世界持续地关注热潮，在中国，继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之后，又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生态与环境问题已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2013 年 11 月 12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生态热”持续升温，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理论以及生态创作实践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阵阵浪潮。而这样的研究，不仅是与时俱进的表现，而且也有助于中国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的建设。

除此以外，研究生态美学及其相关的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等，也是文学与美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需要。近百年来，我国的文学与美学理论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用他们卓越的成果影响着一代代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 年版，第 517 页。

学人。但是，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原有的理论不是总能够符合时代的需要，某些局限也日益凸显出来，比如，实践论美学也在当下的时代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实践论美学以认识论为基础，对审美的认识功能给予过多地关注，强调审美是一种对象的人化，而忽视了对对象（如自然）的本身价值，这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形成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明显倾向。生态美学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就是对这一缺陷的弥补，它以存在论为基础，打破主客二分的局面，强调人与对象之间的平等、平衡关系，而这种观点又契合了当下的现实形势，可以这么说，与生态美学相关的理论研究是文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不仅如此，有学者还认为：“介入性、反思性、批判性是新世纪以来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发展建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的一种越来越明晰的思想和学术品格，因而业已成为当前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以及文化批评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热点和前沿问题，为近十年来的文艺学和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①从“发展必然”到“学术生长点”可见，研究与生态美学相关理论的意义与价值不容小觑。而运用新的生态美学理论去观照文学文本，将会为我们开启一个崭新的认知视角，并且用生态美学理论去指导文学创作实践，也会有利于文学文本内涵意蕴的深化。当然，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生态美学作为一个暂时还未成熟的理论，还需要从众多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提炼美学的思想，使其理论进一步地完善。

二、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和学术目标

西方的生态理论建立得较早，因此，关于生态美学思想的研究首先就离不开对西方生态理论的关注。“生态美学”，是在国际性的生态理论热的大背景中提出，并结合中西方的生态美学资源，形成了中国生态美学本土化的理论。其次，在中国，本土化的生态理论与生态写作也在不断地成长、完善，对此的探讨也十分必要。本文的选题也正是以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现状为背景的。现将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大致归纳如下：

第一、生态美学理论及其相关的理论著作主要有：[德]汉斯·萨克斯的《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钱俊生、余谋昌的《生态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年版），余谋昌的《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徐恒醇的《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 2000 年版），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 2000 年版）、《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学林出版社 2011 年版），袁鼎生的《生态审美学》（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

^① 党圣元：《新世纪文论转型及其问题域》，《北方论丛》，2009 年第 3 期，第 31 页。

版),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盖光的《文艺生态审美论》(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张艳梅、蒋学杰、吴景明的《生态批评》(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党圣元、刘瑞弘的《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王静的《人与自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宁梅的《生态批评与文化重建》(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李长中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王育烽的《生态批评视域下的美国现当代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等。

第二,关于生态美学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有许多,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以徐恒醇、鲁枢元、曾繁仁、陈望衡等文艺美学家对生态美学以及相关的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的理论论述,介绍了生态美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及其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等。如徐恒醇的《生态美学放谈——生态美学论纲》(《理论与现代化》2000 年第 10 期)、《生态美学的理论前提和研究对象》(《鄱阳湖学刊》2009 年第 3 期),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文艺研究》2002 年第 9 期)、《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兼谈消费文化、城市文化与美学的生活化转向》(《文艺争鸣》2010 年第 11 期),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 年第 9 期)、《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文艺研究》2007 年第 4 期)等。二是从生态审美视角论述中国古代的生态审美智慧,弘扬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审美智慧。如曾繁仁《试论〈周易〉“生生为易”之生态审美智慧》(《文学评论》2008 年第 5 期),济南大学邵珍的硕士论文《道家自然观所蕴涵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山东大学赵凤远的博士论文《庄子的生态美学思想研究》,山东大学李琳的博士论文《中国佛教的生态审美智慧研究》等。三是以生态美学的理论视角解读文本或观照当今的生态文学创作。前者是对现当代的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人具有生态美学思想的作品进行解读。如湖南师范大学邹玲平的硕士论文《〈瓦尔登湖〉的生态美学思想》,扬州大学李刘静的硕士论文《论陈应松的神农架地域生态小说》,谢建文《张炜小说中的生态美学追求〈九月寓言〉浅析》(《平原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刘鲁南的《浅析迟子建作品中的生态美学思想》(载于《作家作品新论》),王平、贺天忠的《论李传锋生态动物小说“物性真实”的审美价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6 期)等。后者主要是对当今的生态文学创作热表达各自的审美认识,如刘亚利、张学军的《论新世纪生态小说的审美取向》

(《小说评论》2010年第1期),宋俊宏的《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的回顾与反思》(《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4期),雷鸣的《当代生态小说的审美迷津》(《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赵树勤、龙其林的《新世纪生态小说论》(《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等。

虽然上述资料里有很多是关于生态美学理论和生态小说批评的,但是,目前生态美学思想理论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是正在成长的理论,难免有各持己见之说,很难形成统一的定论。而关于生态小说的研究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生态小说文本分析为基础,提炼出具有共性色彩的生态美学思想理论,并对新世纪的生态小说创作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希望可以对前人的研究有所突破。

本文主要立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之下,从生态美学理论角度出发,以生态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生态小说为例进行文本分析,重点研究小说文本中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的形态特征,并试图揭示小说文本中生态美学思想的价值与不足,以期完成对新世纪生态小说中生态美学思想的共性研究。

第一章 生态美学与生态小说

生态问题是目前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自 1866 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格尔（E·H·Hacked）首次提出生态学这一概念之后，“生态”这一术语逐渐被人们运用，特别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导致的种种生态危机之后，生态学蕴含的生态思想被广泛借鉴到其他学科。以“生态”作为前缀或后缀的词语几乎涉及自然、社会、人文等学科各个领域，如人口生态学、雨林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等。生态主义思潮以及生态危机引起了大批的学者、作家、美学家、文艺评论家对生态的关注。我国 20 世纪末本土的美学家提出“生态美学”这一概念，综合了深层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批评及生态神学等多个领域的生态思想，给世界美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这一概念成为中国美学与世界对话和接轨的一个契机和媒介，为中国美学走向世界并最终与世界融合奠定了基础”^①。另外，作为生态思潮重要分支之一的生态文学，对世界生态与生存问题的反映、批判以及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生态小说作为生态文学中的主流样式，也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生态学者帕特里克·穆菲（Patrick Murphy）就曾指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的研究重点。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代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②

第一节 生态美学的缘起

生态美学，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至今，在我国美学研究领域展现了其蓬勃的生命力。因其研究的对象和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与现实中的生态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可以说，生态美学是我国新世纪美学研究一个极其重大的前沿理论形态，为我国甚至是世界的文艺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生长点。

一、生态美学的界定

在我国学术界，第一次提出“生态美学”这一概念并对之进行阐释的是李欣复。1994 年，他在《论生态美学》一文中指出，生态美学“是伴随着生态危机所激发起的全球环

^① 张华、高旭东：《生态美学及其在中国当代的建构》，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14 页。

^② 转引自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当代外国文学》，2003 年第 1 期，第 138 页。

保与绿色运动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研究地球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是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门，其构成内容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物质生产生态和精神文化生产生态三大层次系统”^①。这篇文章虽未对生态美学的内涵进行详细界定，且认为生态美学从属于环境美学，但该文从其产生背景、基本原则及发展前景角度论述生态美学，是我国第一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生态美学学术论文，应该可以算作是中国生态美学萌芽的标志。

对“生态美学”进行界定，首先应该明白“生态”一词的含义。生态(Eco-)一词源自希腊oikos，原意是指“住所”或“栖息地”。“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②既然是强调与“环境”的关系，且在20世纪的西方，只提出“环境美学”而无“生态美学”，是否中国的“生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就等同于西方的“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在西方国家，许多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阿诺德·柏林特等)认为生态美学属于或等同于环境美学。中国也不乏这样的观点，如陈欣复。那么，到底两者有没有区别?答案是肯定的。国际美学学会副会长、土耳其美学家约尔·艾兹恩认为：“环境美学并不总是关心自然及其健康状态，环境可能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把人类放在中心焦点的地位。生态美学当然也与人类健康的活动有关，但其主要的关注焦点是自然及其良好状态，所有的美学概念和作品(如艺术作品)都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自然的良好状态相关联。”^③我国学者王诺也认为环境美学是环境主义，生态美学是生态主义。前者的基本精神是：“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④而后者“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⑤简而言之，环境美学依然是主客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但生态美学则是强调主客相互依存的“生态整体主义”。

以此看来，“生态”一词对于生态美学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它体现了人类观察世界的视角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因此，“生态美学”，即

^① 李欣复：《论生态美学》，《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第53页。

^② 宋薇：《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自然美学辨析》，《晋阳学刊》，2011年第4期，第53页。

^③ 转引自李庆本：《国外生态美学状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17页。

^④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⑤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是生态学与美学相应而形成的一种体现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新型学科。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生态美学是指以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为重点,仅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处于一种平衡的生态审美关系。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审美关系,是一种研究人与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等多重审美状态的、符合生态规律的美学观。因为广义的生态美学是一种更为全面、广泛,具有普遍性的美学观念,与“生态”一词强调的生态整体思想相契合,所以本文主要采用广义的生态美学概念。

二、生态美学的社会文化语境

生态美学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它的发展与走向不仅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而且还受到文化哲学思潮的影响与制约。

(一) 文明的过渡: 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1. 工业文明的“礼物”

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20世纪缓缓落下了帷幕。20世纪是工业文明高奏凯歌、灿烂辉煌的时代。那么,工业文明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

纵观工业时代的人类生活现状,人们吃穿不再只求温饱,还注重养生与享受;住的不仅是“广厦”,而且“广厦”之内的现代化电器设备,让人们可以生活得四季如春;汽车、列车与飞机让世界变为“地球村”;手机、电视与电脑让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交流“触手可得”。可以这么说,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社会经济和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使人类生活质量大幅度地提高。但是,它在给人类带来幸福之际,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成倍地增多,地球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而造成资源短缺。据资料显示,世界人口从19世纪初的10亿增长到目前的70亿,众多人口活动使全球的土地资源退化大约20亿公顷,相当于人类可耕种土地资源的41%。对于矿产资源,按照目前的开采规模,地球上探明的可采石油储量仅可使用45~50年,天然气储量可使用50~60年,煤炭可使用200~300年,主要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可使用几十年至百余年,到2020年,地球上的大多数矿产资源包括铜、铝、锡、锌、金、银等都将被开采完毕。森林资源减少的速度也甚是惊人,全世界每年约有1200万公顷的森林消失,其中绝大多数是对生态平衡至关重要的热带雨林,如世界热带雨林之首的亚马逊森林,平均每5秒钟就有一个差不多足球场大小的森林消失。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生命行星报告2008》指出,人类正以大大超越其更新能力的速度消耗着地球的自然资源。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执行长官德莫特·格尔曼在2012年的报告中又强调:“人类现在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我们还有第二个地球可以用似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耗尽地球的一半资源,那么到2030年,两个地

球都不够人类用。”^①

其次，资源的开发必然导致对地球环境的破坏。近年来，工业化积累的大气污染造成了全球的温室效应与臭氧层空洞，使人类生存与发展受到严峻挑战。20世纪，60%的河流受污染，40%的地区受酸雨危害。再加上有毒化学品的污染，人类与动植物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堪忧。目前市场上约有7~8万种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有危害的约有3.5万种，自50年代以来，涉及有毒化学品污染事件越来越多，全球的土壤、大气、生物都不同程度的被污染、毒害，甚至连南极的企鹅也未能幸免。

这样的生态危机就是工业文明送给人类幸福的附带“礼物”。对于这样的“礼物”，应该由谁承担责任？据全球节能环保网资料显示：占世界人口不到24%的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能源的75%，他们向大气排放的CO₂的人均排放量比发展中国家的相对量更高，发达国家对资源环境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近几十年来，不顾一切的追求经济的发展也应对生态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我们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一味追求GDP的增长，生态问题也日益严重。首先是资源危机。本来就不足世界40%的可耕地资源，由于不合理开垦，过度放牧，乱采滥挖，使得中国土地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大，甚至造成部分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省市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所规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长江、黄河源远流长，大小湖泊不计其数，但是，我国的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5，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王诺曾根据《增长的极限》中“资源总量 / 消耗速度 = 世界末日”这个公式推算中国奔向末日的速度：“人均不可再生资源储备不足世界平均值的1/2、单位产值资源消耗率约为世界平均值3倍的中国，正在以高于全人类6倍的速度奔向末日。”^②其次是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在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竟占了59.6%，更不用说直接暴露在陆地表面的湖泊了。提及大气污染，“雾霾”、“PM2.5”等最近大家都能耳熟能详的词汇让人们深切感受到环境污染对人带来身心健康的危害。国家环保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依据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对SO₂、NO₂、PM₁₀、PM_{2.5}、CO和O₃六项污染物进行评价，74个新标准监测实施第一阶段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4.1%。工业粉尘造成的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0.6%。2013年的《经济参考报》也显示，全球10大空气污染城市中，中国占了7个。再回顾这些年来环境污染带来的气候异常及自然灾害，台风、雪灾、冰

^① <http://roll.sohu.com/20120518/n343530474.shtml> “《生命行星报告 2012》称发达国家才是最大污染国”。

^②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雹、高温、干旱、洪涝、泥石流等异常多的灾害，让人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2. 生态文明的觉醒

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中曾描述这样一个场面：鸡犬牛羊甚至连人都突然地、不可解释地死亡，不断来袭的新病也让医生束手无策，森林里没了鸟的歌声，河水里没了鱼的欢跃，只有一片死亡的寂静覆盖着整个小镇。这虽是卡逊“明天的寓言”，但她描述的场景已经部分的在我们生活中应验。疯牛病、狂犬病、禽流感时有发生，医生刚从“SARS”病毒的手中夺回人类的生命，又对南非的“埃博拉”病毒束手无策。人类的猎杀致使鸟类珍禽濒临灭绝，工业废水、农药污染使河流早已失去生命。寓言变成现实，人类是否应该觉醒？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卡逊的书遭到了当时农药生产资本家和一些科学家利益集团的批评、围攻，甚至人身攻击，但是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版，美国颁布了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肯尼迪总统读了这本书，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纽约时报》也把卡逊称为“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妇女之一”，因为她是英勇无畏的生态斗士，仅用一支笔与一颗心唤起了人类对生态问题的高度注意。可以这样说，《寂静的春天》标志着人类对工业化、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开始，对生态问题觉醒的开始。1972年颁布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正式标志着人类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

尽管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具有外源后发性，但是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的严重程度却不逊于西方国家。因此，中国生态文明的觉醒虽起步比西方晚，但严峻的形势致使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2004年4月30日，《光明日报》在《论生态文明》一文中指出，“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并且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①最近几年关于“生态文明”的建设问题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十六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新的发展理念。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并把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提出的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之中。而在十八大中，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十八大报告共分十二个部分，在一开始的三个部分就分别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成就、重要地位、重要目标。不仅如此，报告在第八部分中，全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内容，全面而又深刻，完整地描绘了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论生态文明》，《光明日报》，2004年4月30日，A1版。

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

生态文明的觉醒让西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家政策、法律、文化等方面对生态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与要求，这让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看到了曙光。关注生态，不仅是国家之事，人人都应树立生态意识、承担生态责任。在哲学领域，哲学家用一种新的世界观启迪人们的生态智慧；在美学领域，美学家用审美的思维启发人们的生态意识；在文学领域，文学家用尖锐的笔触警醒人们的生态责任。

（二）文化哲学的转型：认识论走向存在论

21世纪是一个新的时代，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认为，这是一个超越现代世界、建设后现代社会的时代。而要建设后现代社会，首先需要战胜现代主义世界观，实现一次哲学范式的转换。他说：“我们只有摒弃了现代世界观，才有可能克服目前的各种建立在这种世界观之上的、用于指导个人和社区生活灾难性的生活方法。”^①

近代哲学以笛卡尔思想为开端、以认识论的身份出现，为人类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人自身，把理性作为对象确定性存在的基础，使哲学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他还发现了主体对象与客体对象之间二元分裂的关系，人与自然、思维与物质是分离和对立的，且认为主体的角色只由人来充当，人以外的世界万物都是客体。从此世界被主客二分，形成了近代哲学的基本格调。但是，世界被二重化也标志着认识论在一开始就蕴含了分裂与矛盾。在认识论内部矛盾出现时，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些哲学家们也尝试去解决。如康德，在他看来，人和世界的分裂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他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主要是，强调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把主体看成是具有统摄能力的先验范畴形式，把客体看成是可塑性的感性材料，通过认识主体以先验范畴形式对感性材料的综合产生知识的方式，来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综合消除主客体分裂的尝试又具有不彻底性，因为，众所周知，康德的主体仅能对现象界的现象进行综合，而对超验的物自体却束手无策。因此，康德的哲学依然是认识论的二元分裂，而这种以分裂与矛盾为特点的认识论哲学一直未被真正解决，直到西方古典哲学的终结、当代存在论哲学的出现才逐步得到解决。

当代存在论哲学的创立者——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康德解决主客体矛盾的尝试是失败的，究其根源，主要是立足点出现了问题，“从认识论的立场来解决认识矛盾，而在认识论之内是无法彻底解决认识自身的矛盾的”^②。因此，要去

^① 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② 欧仕金、王明德：《从认识论到存在论——论海德格尔对近代哲学视野转换的尝试》，《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3期，第21页。

真正解决这一矛盾，克服主客二分，必须进行一次哲学范式的转变。海德格尔就尝试通过建立存在论来实现这一哲学视野的转换。

从认识论人与世界的“主客二分”的关系中得知，客体是被主体综合的对象，反映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自然是被人使用、控制、征服的对象。这里的人与自然根本上是对立的、不协调的。而当代的存在论哲学的初步成熟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为标志，这种存在论哲学强调一种“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模式，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协调提供了可能。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在世中展开其生存的”，“此在”意思即人以及人与周围事物构成的关系性生存状态，而这种“此在”永远是“在世”

(being-in-the-world)的存在者。简单来讲，人与自然在人的实际存在中产生关系，自然是人存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然是被包含在“此在”之中的，也即是人和自然两者统一协调的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可以说，存在论哲学是整体思维的哲学，它抛弃了传统认识论把人看成是与世界分裂的、单一的主体这种观点，而认为人融身在世界之中，人与他的世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人无需刻意从自己走向世界，人本来就在“世界之中”。这就颠覆了认识论主客二分的观念，也颠覆了认识论的主体思维造成的对人地位的过度张扬。

20世纪，当代存在论哲学逐步取代传统认识论哲学，在西方生态伦理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后，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深层生态学，他把自然科学的实证探究与人文科学世界观探索相结合，形成了生态存在论哲学(生态哲学)。这种新哲学理论为其它生态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深层次的理论指导。生态美学就是以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形成了关切人存在及其审美实现问题的存在论美学。生态哲学对生态美学的主要贡献有：一、关于世界的存在。主张世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系统中的所有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都有着网络式的生存环境，它们是一种相互联系与作用、彼此包含与共生的存在。二、关于整体与部分。生态哲学是整体论的世界观，但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不同部分组成的有序系统，同时也不强调某一部分(如人)的作用。另外，它还注重自然世界整体上的动态平衡，虽然每个部分可能因为进化的过程出现不平衡，但是这整体的系统应始终保持动态的平衡。三、关于主体与客体。生态哲学反对绝对主客二分，虽也作主客分析，但是与认识论有着巨大区别。认识论中主体是唯一的，是指人。而在生态哲学的主—客关系中，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人是主体，自然界万事万物都可以是主体，且人也不单纯的是主体，有时也充当客体。换句话说，在生态哲学的视野中，没有绝对的主体，也没有绝对的客体。正如弗兰西斯·培

根所说：“我们不可以忘记自己不是站在自己要努力驾驭的那个体系之外。我们不仅作为主体站在它面前，而且也作为客体受其制约。”^①因此，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此被打破，没有绝对的主体，就没有绝对的中心，有的只能是生态整体主义原则。

生态美学以生态哲学的生态整体主义原则为基础，并汲取了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美学思想，打破了传统以认识论主客二分为基点的美学思维，使中国美学研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但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美学也有着自身的缺陷，它的存在论有一种主观唯心论的倾向，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来自于它的存在，只要承认世界的存在是无可替代的，其内在的万事万物就可以统一，虽然世界得先存在才能统一的观点没错，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②。伊格尔顿就曾针对这种缺乏物质性的存在批评道：“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深不可测的，一种没有根基的基点。”^③因此，生态美学要避免这一缺陷，就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实践论观点，把物质性的实践作为存在的基础，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改造，扬弃其存在论的虚妄，为生态美学找到存在的基点。

第二节 新世纪生态小说

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大文类，在人类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无数光辉灿烂的篇章。今天，在我国文学界小说业已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成为反映时代的晴雨表。梁启超曾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④既然小说的地位如此厚重，那么当下盛行的生态小说自然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生态小说的界定

在阐释生态小说定义之前，应该先介绍一下生态文学。何谓“生态文学”？20世纪初，生态学被引入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它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有人也称它“环境文学”“公害文学”“自然书写”“绿色文学”等。但是，笔者认为，这些词都不够妥帖。“环境”“公害”偏向于人的利益，依然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自然”“绿色”范围太过狭窄，只

^① 转引自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③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④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选自《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884页。

强调自然环境在作品中的存在，而忽视除此之外的生态因素。但是，生态文学不仅仅描写的是自然、绿色环境，它还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紧张、对立、冲突等关系，且重在揭示造成这些关系的社会根源。有时一些作品不描写自然景物，但却因其在作品中发掘导致人类破坏自然的社会原因而被称为生态文学作品，如贾平凹的《高兴》。王诺给“生态文学”下的定义是：“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①由此可见，生态文学丰富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内涵，把价值利益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而不局限于人的价值利益，这是其他的文学写作所不能超越的。生态文学兴起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许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影响。雷彻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使得次年成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杰伊·W.福莱斯特《世界原动力》的问世使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得以诞生；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第一次以科学的数据与推理，向人类展示一个有限的地球经过人类无限的增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震惊了全球。还有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成为“专门研究自然和诗学组合理论的开创性经典著作”^②。奥尔多·利奥波德“像山那样思考”的名著《沙乡年鉴》，成为生态文学的重要经典。中国的生态文学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沙青《北京失去平衡》、徐刚《伐木者，醒来！》、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一系列生态报告文学，给人类破坏环境起到了警示作用。接着，在延续生态报告文学的兴盛同时，散文、诗歌、电影都有反映生态这一主题的作品，但是，唯有在小说领域取得实绩。哲夫的生态小说《天猎》一书发行量足有近百万册，成为当年最火爆的书。乌热尔图的一系列生态小说《七岔犄角的公鹿》《一个猎人的恳求》《琥珀色的篝火》等都获得过大奖。还有张抗抗的《沙暴》、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鱼的故事》和胡发云的《老海失踪》都成为生态文学的优秀代表，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生态小说不仅在国外成为一种热潮，在国内也受到作家们的热捧。可见生态小说在生态文学中的地位不可小觑，正如美国生态学者帕特里克·穆菲认为的那样，生态小说应成为未来生态文学的研究重点。那么什么样的小说才是“生态小说”？其实，把王诺给出的“生态文学”定义中的“文学”一词换成“小说”一词即可。因为，生态小说和生态文学本来就是种属关系，后者包含前者，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态之一。但是，当代

^①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② 【美】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作家们并不全是有意识地进行生态小说创作，生态危机触发他们的生态意识，使他们的思想观点与生态思想不谋而合，他们也不一定深通“生态整体主义原则”“生态规律”“大地伦理”等一些生态理论术语的内涵。所以，作家们无意识地创作生态小说不一定都纯粹符合生态小说定义中的每一项规定。那么，怎样认定一部小说作品为生态小说呢？笔者认为，可以按照赵树勤、龙其林在《当代中国生态小说的发展趋势》中，把具有生态思想意识的小说分为广义上的“泛生态小说”和狭义上的“纯生态小说”。“泛生态小说”是指“只要小说能够(即便不纯粹)站在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基础上，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反映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表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精神危机，以生态整体主义的眼光、运用生态学科知识对现实生活中的生态问题做出科学或文化剖析以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寻求解决之道，我们就可以从广义的范畴上将其视为泛生态小说”^①。而“纯生态小说”较之“泛生态小说”的生态思想深度更加明显，“更多倾向于对现实环境问题作出明确生态主旨的传达、更具有科学分析的理性倾向”^②，如乌热尔图专门以生态为题材进行创作，还从事生态文学研究，他的生态题材小说在揭示造成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方面，更加理性，更加尖锐，更加勇敢。简而言之，无论泛生态小说在生态思想上是否“纯粹”，我们都应把它纳入生态小说研究的范围。因为，即便“不纯粹”给生态小说带来某些缺陷，但只要善于发现缺点，改善缺点，还是可以给生态小说成长提供动力的。

需要强调的是，泛生态小说与纯生态小说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因为，在实际的创作中，中国作家的生态小说创作大多是自发的，如出生在内蒙古草原的郭雪波，创作了《银狐》《狐啸》《狼孩》等生态小说，当其被问及创作此类题材的缘由时，他说：“一个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是基本创作原则。尤其，在我老家，狼和狐狸正在绝迹。”^③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的生态创作大多由现实的感触而发，基本上没有像西方20世纪生态文学的创作一样，是在各种生态理论的熏陶过程中萌发的。西方很多的生态文学家很多时候就是生态理论家，如《瓦尔登湖》的作者亨利·梭罗，是美国著名的生态理论和生态文学先驱；《沙乡年鉴》的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多，是美国现代生态理论和生态文学的奠基人。而我国的生态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我国的生态美学在上个世纪末才诞生。所以，中国的生态小说大部分属于泛生态小说。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态理论思想与生态科学知识愈来愈被作家们所熟悉，作家们也从无意识的泛生态小说创作转变为有意识的纯

^① 赵树勤、龙其林：《当代中国生态小说的发展趋势》，《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0期，第383页。

^② 赵树勤、龙其林：《当代中国生态小说的发展趋势》，《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0期，第384页。

^③ <http://book.sina.com.cn/news/a/2006-02-10/1002196624.shtml>“郭雪波：《银狐》跟《狼图腾》是两码事”。

生态小说创作。

二、新世纪的生态小说

从中国生态小说产生至今，上世纪80年代应算是启蒙期，90年代应是其上升期，而进入21世纪以后，生态小说进入发展的调整期，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这不仅是生态小说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受到我国的本土理论和生态美学建立的影响。那么，较之新世纪前的小说，新世纪生态小说有何不同？

（一）自然：从叙事背景到叙事对象

在小说叙事中，优秀的作家肯定少不了用自然环境来展示独特的世态风情。在小学的语文课上，我们就被告知自然环境在小说中有五个作用：渲染故事气氛、烘托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暗示社会环境、深化作品主题。以主客体的方法来分析，无论哪一作用，“自然”都是客体，是作为主体的存在背景。中国文学中的“自然”自古就有着作为背景的传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两种自然物“鸟”和“花”本身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两者能作为背景衬托主体也即是诗人的情感。在20世纪的现当代小说中，沈从文的《边城》写尽了湘西的自然美，这自然是诗性的自然，它作为背景传递着人性的美好。小说中的湘西山水明净，翠峰叠嶂，清新如画。山水间有座座生趣盎然的小山城。山上花草树木，山下流水潺潺；鱼鸭、船只水中游，店铺、人家城中住；街上人头攒动，有柏子那样健硕直硬、不受拘束、喜欢飘荡的男人，也有如翠翠那般半通人事、淳朴善良的女人。在这幅山水鱼船的画中，只有湘西山里人蛮野淳朴才是这幅画的灵魂。所以，在沈从文的小说叙事中，山水再美，自然景物再诗情画意，最终，自然只是背景，为了烘托山里人的人性之美。

自然从叙事背景转向叙事对象要得益于作家们生态意识的萌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加大，隐藏在经济快速发展之下的是人类欲望的肆意膨胀以及人类灵魂的污浊失衡。环境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等构成的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当代人的生存。面对威胁，人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来应对。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集体和个人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保护生态，尤其是一些生态作家和学者，用对地球命运的深深关注和忧思在创作和研究，来表达对人类生态生存的关怀。因此，在生态小说中，生态危机激发的生态意识使作家更加重视“自然”这一对象，并且不再把它作为烘托主体人物的背景，而是作为小说叙事的主体对象。生态小说家郭雪波被称为“大漠之子”，他连续30年一直关注沙漠、草原沙化问题。他写大漠中的风沙、动物、植物，他写赞扬人与自然和谐共抗沙漠，他也

写批判人类欲望造成的草原沙化灾害。在他的生态小说中，自然是他叙事的主体，是他珍视的对象，也是他敬畏的对象。他钦佩沙漠中的植物为了减少烈日对水分的蒸发所作的改变，“怪柳把叶子缩小成珠状或棒状，沙蒿的叶先破裂成丝状，梭梭和沙拐枣干脆把叶片退化干净，全靠枝干进行光合作用。”“为在强光下生存，多数植物又演变成灰色以反射阳光。为了在逆境中生存，可以说，沙漠里的所有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死亡的斗争中成长着”^①。郭雪波的小说还关注弱小的动物生命，他的《沙狐》《沙狼》《银狐》无不倾注了他对人与动物、人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细腻关注。在他的小说中，狐狸、狼一改在以前小说中被咒骂的地位，它们捕食毁坏草原的老鼠和黄羊，成为人类得以生存的功臣。

新世纪的生态小说虽然把关注的对象从“人”换到了“自然”，使得“自然”从叙事背景上升为叙事对象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说生态小说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走向“自然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因为新世纪的生态小说是以包括人和自然在内的生态系统整体为审美对象的，它不是“中心主义”而是“整体主义”，这也是新世纪生态小说的优点所在。

（二）自然：从人类中心的泛道德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

在有关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中，许多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其中重要的思想根源。《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从两方面定义了人类中心（anthropocentric）：“（1）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2）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②可见，人类中心主义，就是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的主宰，一切以人为尺度，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就鼓励了人类控制自然、统治自然的欲望，使贪婪的人类对自然进行无限制地掠夺，最终造成生态危机。

20世纪，一些西方学者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点的缺陷，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尤其在生态文学中，作家们对人类中心思想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竭力批评与大胆揭示，希望引起人类的警醒。这种批判也导致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修正，形成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即人类中心的泛道德化，“主张把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向外延伸，将人类道德关心延伸到非人类的动物和所有有感觉生命，甚至对整个自然界给予道德承认和保护，表示对非人类的道德的肯定”^③。这种思想表现在生态小说中，常常是对动物及其他弱小生命的保护。我国动物小说的兴起与繁荣也受这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如土

^① 郭雪波：《狼与狐》，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② 转引自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③ 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家族作家李传峰，以写动物小说介入文坛，他早期的动物小说就是通过对动物的人道主义关怀来表达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愿望。80年代初期，他的作品主要有《退役军犬》《毛栗球》《母鸡来亨儿》《牧鸡奴》等，他通过赋予动物以人性的思维来观察世界。忠义护主的军犬黑豹拥有人性的善良与爱心，最后惨死在残酷、凶暴的人类手中；本为爱情而决斗的山鸡毛栗球在人类的驯化下丧失了野性住进了漂亮笼子，在以人类欲望为中心的关系中相互依赖；黑豹的后代狮毛狗成为主妇的宠物犬，养了一身毫无野性的肥膘。在这些小说中，李传峰表达了对在人力控制下动物生存的同情，希望赋予动物以人类一样的自由与爱情，但是，这样的同情是人道主义的伸张，是人类泛道德主义的关怀，依然是以人类为中心。

经历了早期动物小说不成熟的阶段，李传峰后来也意识到，并非保护动物就能排除人类中心主义。在他90年代初的作品《最后一只白虎》中，他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第一次放低视线，把视角从“人看动物”转为“动物看人”，讲述了曾对白虎感恩戴德的人类借助强悍的工具捕杀白虎，迫使调节生态平衡的白虎坎坷流离、几经生死，“唱出了一曲悲壮的生命赞歌，表现了作者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科学与愚昧、文明与野蛮的矛盾斗争的深层的哲学思考”^①。这部标志着李传峰转型的生态小说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推荐在香港再版，获得了多位知名评论家好评。但真正代表李传峰生态意识思想成熟的小说是在2003年《民族文学》第1期发表的《红豺》，作者用生态整体主义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作者描写了人类在利益的驱使下毁坏自然生态环境，进而导致珍稀动物灭绝，最终造成人的悲惨结局。人破坏自然，自然给人带来悲惨的命运，这就体现了作者经历了生态意识的飞跃后，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转变，用系统的、整体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无论哪一部分的缺失都会造成各自生存的不完整。生态整体主义的转变，这不仅是新世纪李传峰小说的特点，也是其他新世纪生态小说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针对新世纪生态小说的这两个时代特征，本文选取的生态小说文本不仅是时代特征的集中体现，而且还具有明显的生态美学思想。现附上本文选取的主要作品：陈应松《哦，我的可可西里》（《小说界》2001年第1期）、《金蚀可可西里》（《天涯》2002年第2期）、《可可西里的格桑梅朵》（《鸭绿江》2008年第2期）、《可可西里狼》（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陈应松《豹子的最后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太平狗》（《陈应松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猎人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叶广苓《老虎大福》

^①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编：《李传峰研究专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1页。

（《人民文学》2001年第9期）、《猴子村长》（《北京文学》2003年第5期）、《黑鱼千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贾平凹《怀念狼》（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高兴》（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雪漠《大漠祭》（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狼祸》（《狼祸：雪漠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年版）、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杨志军《藏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阿来《空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2005年第6期）、郭雪波《狐啸》（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银狐》（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狼孩》（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京夫《鹿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传峰《红豺》（《民族文学》2003年第1期）、张炜《刺猬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克威《中国虎》（《当代》2007年第1期）、赵本夫《无土时代》（《长篇小说选刊》，2008年第4期）

第二章 生态小说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生态小说与生态美学两者都是当下生态思想的重要体现，两者之间关系紧密。生态小说对生态审美思想的创作实践，可以给生态美学的理论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而生态美学对深层生态思想的研究，也可以给生态小说的完善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对新世纪生态小说中的生态审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美学的研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多重审美关系，而作为生态审美思想的实践方式之一——新世纪生态小说，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这一生态美学思想：一、用回望的视角对曾经和谐自然家园的赞美，希望人类在美的熏染中反思自己的行为；二、用悲剧的方式对造成当下生存危机的行为、思想进行批判，期望人类在面临末日危机时能够有所警醒；三、用灵性诗意的理想表达对未来生存方式的审美追求。因此，本章也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把新世纪生态小说中的生态美学思想概括为三个特征：自然取向、末世情怀、生态理想。

第一节 自然取向

生态作品中的生态美，首先表现为作家对赖以生存的自然关注，这既包括对自然风情的描绘，也包括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讴歌。“自然”一词，广义的范畴等同于宇宙、物质、存在、客观实在之类，是指包罗万象的一切存在物，包括人类社会。狭义是指把人类社会排除在外的物质世界。本节“自然取向”中的“自然”是广义的自然，既包括物质世界，又包括与物质世界相关联的人类社会。因此，生态小说中的“自然取向”即是指小说对包括自然环境、动物与人在内的审美取向。

一、田园牧歌的审美方式

审美活动作为人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主要是指在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进行审美创造与欣赏。而审美方式主要是指在审美活动中，对客体对象进行审美观照、判断、评价的各种方式。新世纪生态小说普遍采用田园牧歌式的画卷描述来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并判断只有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才是生态的，因此，生态小说的创作者对生态的审美进行诗意化地、田园牧歌化地处理，成为其审美的主要方式之一。

“田园”和“牧歌”其实是中西方的两个不同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田园”主要表现在以田园景色和田园生活为主题的创作之中，如田园诗派的代表陶渊明，他的创

作就表现出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淡舒适的乡间田园生活。而“牧歌”（Pastoral）是西方表现牧人田园生活情趣的文学体裁，最早发源于古希腊，忒奥克里托斯是最早的牧歌创作者。在艾布拉姆斯的《欧美文学术语辞典》中，牧歌“是一首精美的传统的诗歌，它表达都市诗人对在理想化的自然环境里，牧羊人和其他农夫纯朴恬静生活的一种怀旧的向往”^①。“田园”和“牧歌”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交叉之处，在此把它们叠加，指的主要是现当代小说中，用理想化的笔墨处理乡间田园题材，表现的是对和谐美丽的自然、单纯质朴的乡土生活的怀念与向往。在生态小说作品中，很多作家用这种田园牧歌的审美方式表现对美好自然家园的追忆，希望唤起人类对生态美的向往，从而停止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这类作品中，自然与故乡是其描绘的主要对象。

（一）灵性自然之大地叙事

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构想，并在其论著《沙乡年鉴》中提出“生态共同体”这一概念，这个共同体就是一个“土地金字塔”式的结构，它除了人还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在他看来，大地就是一个共同体，大地在这一共同体中与人的地位平等，没有大地这一基层，金字塔就会坍塌，人也不复存在。因此，这样的生态伦理就暗示对生态的审美必定少不了对大地的审美。

生态美的特征之一就是灵性的自然之美。在生态作家的笔下，灵性的自然就是大地上的万事万物充满生命与灵气。被称赞为“以理想的人文主义的基尺，呼唤‘大地’情怀”的张炜就曾提出“融入野地”这一审美理想，他的“野地”就是充满生机的自然世界，包括大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张炜的童年生活在胶东半岛海滩平原，平原上有大片的丛林与河流，他的母亲在果园里工作，因此，他的童年基本上都是漫游在丛林、河流、海滩与果园之间，他自小就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决定了他的生态小说《刺猬歌》中野地的诗情画意。小说主要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廖麦和美蒂之间的爱恨情仇、聚散离合，并以海滨荒原莽林的百年沧桑变化为背景，用奇幻诗意的手法编制出了一个个光怪陆离、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小说中的奇人与野地生灵水乳交融地绘制了一幅诗意、灵性的自然田园风貌图。张炜热衷于野地，对生养他的大地表现出执着的情怀，他小说中的大地充满生命的张力：杨树可以“发出亲昵的呼唤”，可以“感受它若有若无的脉动”，可以是“一排英姿勃发的兄弟”^②；“水潭是镜子和眼睛，也是安静的男人，而且是英气

^① 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

^② 张炜：《刺猬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生生的男人”^①；丛林中，大树会托梦，河流溪水都有主人，小刺猬把小孩当宠物养，老熊生病会求医，狐狸、土狼产崽找姍婆。除此之外，野地在彰显它灵性的同时，也滋养了人类。文中，蓟菜可以止血，芥、苋、野芹可以钓黄鳞大鳊，黄鳞大鳊可以让人滋生大力，蒲根不仅可以做酒御寒，而且“富含淀粉的块根蒸在米中，再用嫩嫩的蒲芯儿做汤，香甜得可以用来迎接月亮上下来的仙人”^②，甚至在饥荒岁月，连食土都可以救命。张炜描述这样一个神奇瑰丽的野地，不仅是对故乡田园的追忆，也寄托了他对人类的希望：“我们应该懂得从土地上寻找安慰、寻找智慧和灵感。这不是一种虚指，而是说要真实的泥土上去，到大自然中去。当你烦躁不宁时，你会想起田野和丛林。无数的草和花、树木，不知名的小生物，都会与你无言地交流，给你宽慰。”^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希望人类融入自然，呵护大地，这样才能从大地上汲取生命的滋养。

除了张炜的《刺猬歌》，很多生态小说也表现出了对大地的执着。杜光辉在《哦，我的可可西里》、《可可西里狼》等可可西里系列小说中，用深情的笔触描述了西藏无人区的壮观之景，“可可西里”在藏语中有“美丽的少女”之意。的确，未经人类践踏的那片无人区有着湛蓝的天，洁白的云，连绵的雪山，还有着不计其数、视人类为朋友的黄羊与羚羊，它俨然就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少女。陈应松在《豹子的最后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等生态小说中，描写人与自然的笔调虽粗砺与直率，但是依然能透露出他对大地的挚爱，他在随笔散文中说：“大地多么美好，它生气勃勃。早晨，大地蒸腾着淡蓝色的雾气，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庄稼在风中抖擞着，有模有样地抖擞着，畜禽在那里悠闲地散步和觅食，人声或高或低的喧嚷，流水在蹒跚向前。大地让视野多么辽阔，让心多么舒展。大地给我们喷香的饮食，如花似玉的美女，婴孩的笑靥和老人苍老的歌吟声”“大地会暗示我们，让我们尽情地汲取，汲取她的养料和智慧”“感恩大地——这是我们唯一向大地母亲俯首称臣和回馈的途径”^④。迟子建也用那淡雅、质朴之笔描绘了她故乡东北的那片黑土地，她说：“作为一个作家，心中最好装有一片土地，这样不管你流浪去哪里，疲惫的心都可以有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⑤在她获得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绿地，河流，山川，日月，星辰，驯鹿，白桦林，萨满跳神的舞步，简单形象的岩画，淳朴善良的人性……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有神韵。她笔下的那片土地之美正如酋长瓦罗加唱的那样：“清晨的露珠温眼睛，正午的

^① 张炜：《刺猬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② 张炜：《刺猬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③ 张炜：《绿色的遥思》，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④ 陈应松：《感恩大地》，《长江文艺》，2004年第4期，第1页。

^⑤ 何芳：《论迟子建的温情叙事》，《民营科技》，2011年第1期，第81页。

阳光晒脊梁，黄昏的鹿铃最清凉，夜晚的小鸟要归林。”^①这正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画卷。

（二）温情故土之人性书写

生态美，并非只有自然风光之美，生态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人与自身的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一种由人类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生命共感与欢歌。因此，对生态的审美关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而生态小说对人亦即人性的书写就是生态审美的方式之一。小说中对人性的书写是善恶兼有，但生态小说中对家园回望的这一角度，使作者经常书写故土人性的善以期达到拯救现代人性的恶。乡村山野作为自然的一个意象，它淳朴、宁静、与世无争，它的性质熏陶人的性质。因此，景是世外桃源的景，人也应是真诚善良的人。并且，这人性的善是对自然的敬爱、对他人的宽容、对自己的真诚。

温情故土孕育温情人性。迟子建曾说起她的故土亲人：“也许是由于身处民风纯朴的边塞的缘故，他们是那么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的脸上，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暖意。我从他们身上，领略最多的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②不仅是现实中，在她的小说中也能领略到她口中的人性之美。《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妮浩最能体现人性的光辉，她一生有许多孩子，但为了拯救部族与其他人的孩子，一次次的牺牲自己的可爱儿女。她明明知道“她如果救活了那个孩子，她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子。”但她依然义无反顾。“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妮浩说，天要那个孩子去，我把他留下来，我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去那里。那你可以不去救他啊，玛利亚哭着说。妮浩凄凉地说，我是萨满，怎么能见死不救呢？”^③爱是无私的，不分自己与他人，这就是人性中的“大爱”。妮浩在失去第一个孩子之后，为了救品行恶劣的马粪包失去第二个孩子，接着为了救偷吃食物噎住的小孩，她失去了第三个尚未出世的孩子，最终，在为部落祈雨的灭火跳神中，自己的生命之火一同熄灭。展现在妮浩身上的人性已经不仅仅是对他人的爱，除此之外，她还对“恶”拥有一颗宽容的心，她希望用温情来拯救有污点人，而不希望用对生命的践踏来惩治那些不完全恶的人。马粪包变得体谅他人，那偷盗的小孩懂得知恩图报，这就是温情的力量。

人性的善除了表现为人与人的相处，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上。迟子建说：“童年围绕着我的，除了那些可爱的植物，还有亲人和动物。请原谅我把他们并列放在一起

^①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2005年第6期，第188页。

^② 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第35页。

^③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2005年第6期，第156页。

来谈。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①在小说中，人与自然也是一种友好与平等的关系。鄂温克族人狩猎不杀害幼崽，烧火只烧干枯的树木，每搬迁一个地方都把垃圾深埋，不让垃圾散发臭气，连驯鹿也从不破坏植被，它们边走边轻轻地啃草地，吃树的叶子时，只是啃几口就走。甚至人在死亡面前，依然不忘记对自然的友好。善良的金得不想害了一棵生机勃勃的树而选择一棵枯树吊死，因为他知道，按照族规，凡是吊死的人，他选择吊死的那棵树必须陪同他一起火葬。

在《可可西里狼》的上部中也描写了人们刚进入无人区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苦乐交融的经历，叙事节奏轻松而舒缓，书写一种“田园牧歌”之感。藏民仁丹才旺对自然母亲敬畏而又热爱，绝不踏入佛爷的禁地（无人区），并甘愿用生命去呵护自然；17岁的少年李石柱把自己每天唯一的一片用来补给维生素的菜叶分给因下雪找不到食物的小黄羊；雷指导员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沦陷沼泽的王勇刚，牺牲遗言却是“王勇刚，以后不要再打野生动物啦！”^②叶广苓《老虎大福》中秦岭的原始居民对自然有一股崇敬的亲友之爱，他们从不把第一胎生的孩子称为老大，而是让给山里的树、石头、老虎、狗熊等自然之物，很多孩子都有他们的“杨树大哥”“柴豹大哥”，大福老虎就是二福的哥，人们与它们称兄道弟不仅表现对自然的亲友之爱，更是对自然的生命与力量的尊敬。雪漠的《大漠祭》中对人的本性表现给生活在严酷自然条件下的西部人们带来浪漫的诗意。老顺的儿子灵官与嫂子莹儿的私情，既是个体原始欲望的冲动，又是对苦难女性的救援，更是对家庭的一种责任。为了哥哥，换亲的莹儿嫁给了男性功能丧失的灵官大哥，为了丈夫的尊严，莹儿默默地承受家人企盼生养的灼热目光。于是，正值青春的莹儿把爱意的目光投向了与众不同的灵官。莹儿与灵官一样是为了自己的爱，为了灵官大哥的尊严，为了家庭的和睦，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但是，灵官与莹儿在读者看来并不觉得他们丑恶，反而让人觉得是一种人性之美，是一种对生命原欲的礼赞与认同。

海德格尔说：“物存在，人存在”，“存在者处于存在之中”^③，自然与人是一种互为对象的存在，美好自然孕育美善人性。生态创作运用这种田园牧歌的家园叙述模式，意在对抗现代性城市喧嚣与芜杂，并用呼唤现代人类融入自然来消解城市文明的弊病，以期人类的发展能够回到拥有真善美、平等与和谐的轨道上。

二、动物叙事的审美主题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④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时

^① 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第35页。

^② 杜光辉：《我的可可西里》，选自《新世纪第一届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③ 【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④ 胡适：《胡适全集：文学改良刍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代，用胡适的这句话来概括当代文学中生态文学创作的盛行再切实不过。而在生态小说中以动物叙事为主题的创作占据了主要地位。从生态小说的题目就能看出，《可可西里狼》《豹子的最后舞蹈》《老虎大福》《猴子村长》《怀念狼》《藏獒》《银狐》《鹿鸣》《刺猬歌》《中国虎》《红豺》等，生态小说大部分的题目涉及动物。

动物叙事并不是新世纪生态小说特有的叙事方式，它存在于中国文学史的各个时期，如上文所述，新世纪的动物叙事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摆脱作为背景的对象，摆脱以人为中心、泛道德化的创作。动物长期以来的被遮蔽、扭曲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剥去伦理化的外衣，重新回到自己的本真存在，开始呈现它们作为生命主体的内在价值。人和动物都是生命的主体，而作为生命的主体，“不仅仅意味着活着，也不仅仅是有知觉。生命的主体……有信仰和愿望，有知觉、记忆、有对未来的感觉，包括他们自己的未来；有感觉幸福和痛苦等情绪的生活；有偏好和福利利益；在追求其愿望和目标时有行为能力；有对时间的心身确定能力”^①。因此，在以动物叙事为主的生态小说中，让动物回归自然本位、让动物成为动物成为时代的呼唤。

概括地说，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小说有两个层次，一是认为动物是宝贵的资源，应从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保护动物、认可动物的本真存在；二是超越人类利益观，以“生命”为角度出发，认为动物具有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力，以及相应的道德地位。文学不可能是一点功利都没有的，因此，新世纪的生态动物小说中，两者并存，既从功利又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占了主要部分。

动物性叙事的审美主题对生态小说的意义何在？其实，它是通过对自然界中动物这一生命主体的地位确认，来帮助人类在自然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也即是认为人不是自然中的唯一生命主体，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应该被抛弃。而与大自然的其他成员（如植物、荒野等）相比，动物具有特殊性，它有着原始的道德品性与生命意识的灵性，这也是生态小说热衷于把动物叙事作为生态审美主题的主要原因。

（一）动物原始的道德品性

动物与人对自由的本性追求同样深刻而强烈。《猴子村长》中的猴群被人类关在笼子里，它们以绝食来抗议人类对它们自由权力与生存空间的剥夺，“不自由，毋宁死”。《狼图腾》中的小狼，虽被人类领养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它从未放弃回归自然的决心，即使脖子血肉模糊也不放弃抗争人类对它的束缚与牵制。

爱不限于有理性意识的人类，动物有时演绎得比人类更壮烈。《狼孩》中，母狼受

^①【美】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名、杨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伤，把前腿搭在公狼的脖子上踉跄前行，最后危险逼近，公狼半驮着母狼，消逝在沙漠深处。公狼明知人类的埋伏，毅然决然地救子，面对人类的乱棍，至死不弃腹下的狼崽。

《猴子村长》中，母猴面对猎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喂孩子吃奶，还摘下树叶挤出奶汁作为储备留给小猴，最后用前爪捂住眼睛，用身体挡住枪口，无畏无惧地赴死。

动物要想不依附人类而作为动物本真的存在，肯定动物的原始道德品性是其基础，无论是追求自由的本性，还是父爱、母爱、夫妻之爱自然地流露，都是动物绽放内生命力的基本样式。但动物要作为价值主体的存在，不能仅止于此，它们应有更高道德的行为，有如上文所说的生命主体应该具备的能力，即如人类一样，对生命意识的感应能力。

（二）动物生命意识的灵性

动物除了有知觉、情感之外，它们还有着自己的处世道德方法以及对待生命庄严态度。新世纪生态小说中，作者写了很多关于动物在与人类周旋和共处中流露出的智慧、勇敢、忠诚、仁义、气度等高尚道德品性。作者塑造这些灵性动物的形象意在说明，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并不一定比低级动物高贵，动物也能够诠释真善美。

动物阐释生命意识的灵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智慧与勇敢，《狼图腾》中的狼是其代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曾说：“读了《狼图腾》，觉得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战法很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①张瑞敏的这一段话精辟地概括了狼的骁勇善战与聪明才智。二、忠义与知恩图报，这一品性的塑造是生态动物叙事中最常用手法，《藏獒》三部曲中，獒王虎头雪獒、冈日森格、黑色的狮头母獒同胞姐妹那日和果日等，因为忠诚和无私无畏成了人类的朋友。在人与狼的冲突中，它们要护卫人类朋友的生命安全；在人与人的冲突中，它们要捍卫自己主人部落的领土。《怀念黑潭中的黑鱼》中的黑鱼每年都用丰盛的酒筵和钱币来报答老夫妇允许它们住进黑潭。《狐啸》中的白狐感恩珊梅的一次无意相救，多次解救被丈夫冷落想自杀的珊梅，并在沙漠中不离不弃地相伴在怀孕的珊梅身旁。《狼孩》中的白耳狼感恩人类的教养，对主人忠心耿耿，时常捍卫小主人的利益，并勇于救助被流沙淹没的人类。《中国虎》中的祖祖在被人类害得“夫死子亡”的情况下，依然不忘知恩图报，以牺牲自己的代价解救陷入泥石流当中的斯蒂

^①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封底。

文。动物忠义与知恩图报的高贵道德身份行为超越了传统中只有人才有的完善品格，让人类认识到动物也是具有生命道德价值意义的主体。三、高贵与尊严，人类素以主宰者的身份孤芳自赏，殊不知，动物拥有人类一样的高贵身份与自我尊严。《藏獒》中的白狮子嘎保森格在被打掉尾巴之后，竟然用跳崖的方式来维护自己作为犬中贵族的尊严。

《鹿鸣》中的头鹿峰峰在面对人类贪婪的枪口，以摔碎人类觊觎已久的、象征高贵身份的鹿角来证明自己宁死不屈的尊严。《狼孩》中被捕公狼面对张牙舞爪的人们，连看都不屑看一眼，用一种矜持、傲慢的态度鄙夷人类，以无惧生死的壮士之势维护自己的生存尊严。

三、儿童与老人的审美视角

（一）淳朴本真的儿童视角

自“儿童本位”这一儿童观提出以来，儿童的独立人格越来越被认可与尊重，他们逐渐拥有了与成人同等的话语权，获得了表达对世界感受的权利。在现当代文学中，儿童视角的植入成为小说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所谓“儿童视角”，即是指“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①。

儿童视角是相对于成人视角来说的，因为儿童在观察和描摹事物、讲述和理解事件时表现出区别于成人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以及价值取向。儿童作为个体的初步成长阶段，还未受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大肆浸染，这就保存了对生命的原初体验，有限的认知和天真无邪的思想使他们即使面对沉重痛苦的成人世界，也能用单纯、质朴的口吻表现出对世间万物美好的愿望。因此，对儿童纯真视角的描述成为小说的表现内容，作家也通过儿童特有的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去追寻美好的精神家园。

儿童期是人类生存的原初状态期，这就使得儿童与原始的自然万物容易产生交流与感应，原初的生态和谐之境也易在此形成。从这一点来看，生态小说在表达生态美的意识时，儿童的审美视角成为生态作家惯用的叙事策略并非偶然。作家在表达生态意识时介入儿童视角，一方面是由于儿童与原初状态的自然相契合，具有“同质性”，他们能发现生态自然的美，跟自然能成为朋友，如《鹿鸣》中的五个小孩，出于天生的喜爱这些小动物，夜晚偷偷跑出去看望正在被大人们追杀的鹿群，他们还分成小队暗中帮助养鹿人并收养三头病鹿。这些出于本性的行为使一向高傲的峰峰也“腼腆的接受小女孩的

^① 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第73页。

抚摸，用灰色的眼睛，看着这些友好的天使般的人类”^①。《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被认为痴傻的儿童安道尔，他眼眸里从没有忧伤与仇恨，有的只是美好的事物。被果格力打倒，他就躺在地上向果格力报告他看到的白云，不但不哭，而且还开心的笑，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哭时，他说：“你把我打倒了，我能看云彩，这是好事啊，我哭什么呢？我浑身都是痒痒肉，你踩我，不就是让我笑吗？”^②《老虎大福》中的二福对自然事物有超乎异常的想象力，他时常坐在家门口看雪光里奔涌的群山而心生感动。另一方面是因为未受浸染的儿童视角能够与现代文明中的世俗罪恶形成鲜明对比，构成“异质性”对抗，如《空山》中的兔子在众人对无父傻母的格拉一致排斥的情况下，依然喜爱与格拉待在一起，即使所有人都说格拉用鞭炮炸伤了他，他还是相信朋友：“我起誓，要是格拉哥真扔了这枚鞭炮，不是我，就是他会死去。”^③兔子的善良与信任和大人们的怀疑与推卸责任形成了鲜明对比。《大漠祭》中机灵懂事的引弟被重男轻女的父亲白福骗到沙窝里，善良的引弟相信父亲让她看着的沙驴棒子是金子，为了让“妈妈就不愁钱了。爷爷奶奶也不愁钱了，莹儿姑姑……好多人就不愁了”^④，她独自一人在夜晚的沙窝守候着“金子”，在被冻僵之前依然不忘可以让好多人幸福的“金子娃娃”，“她费力地解开上衣扣子，费力地把那些金娃娃拣了，一个一个地揽在怀中，像妈妈搂她那样，裹了衣襟，紧紧地抱了”^⑤。俗话说“虎毒不食子”，白福的恶已丧失了人性，而引弟对恶的善性理解，让恶在善的对抗中无处隐藏，让恶遭到批判的力度也上升到极致。

（二）智慧执着的老人视角

采用老人的审美视角来观察自然世界是生态小说的一个共性，这里的“老人”通常是智者的身份。荣格曾用“智慧老人”来形容人类“内在所具有的有关意义与智慧的原始意象”，并说：“智慧老人的原型所洞察的是永恒的真理”。^⑥可见，生态小说运用老人的审美视角是为了透视有关人与自然相处的真理，也即是通过老人来表达生态智慧。

生态小说中的“老人通常是与自然最心心相印、默默契合的人，一生的坎坷和磨难都在博大的自然中淡去，他们代表着传统与智慧，通常并有着超人的预感和预言”^⑦。《狼图腾》中的毕力格老人就是草原上智者的形象，“毕力格”一词在蒙语中寓意就是“智慧”，作者通过毕力格老人的视角表达出人与自然相处的生存哲学。老人杀狼，但不赶

^① 京夫：《鹿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②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收获》，2005年第6期，第152页。

^③ 阿来：《空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④ 雪漠：《大漠祭》，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65页。

^⑤ 雪漠：《大漠祭》，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⑥ 转引自申荷永：《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5页。

^⑦ 王静：《人与自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页。

尽杀绝，因为狼能保持草原上的生态平衡；老人反对烧荒，认为会“熏黑腾格里的脸”、“染黑河里的水”，最终倒霉的人类自己；老人认为“天兽人草”合一，“草原是大命”，“草原完了，牛羊马、狼和人的小命都得完，连长城和北京城也保不住”^①。《狼祸》中的孟八爷深谙生物链生态系统法则，“狐子吃老鼠，乱打狐子，老鼠就成精了，铺天盖地，到处打洞，草皮啥的，都叫破坏了。一刮风，满天沙子，那沙山，就会慢慢移来，把人撵得没处蹲了”^②，所以他猎狐适当，帮助警察抓捕盗猎者，最后还放下猎枪，不顾生死，执着地劝诫他人不要为了贪欲毁坏自己的家园。在生态小说中，类似的还有《猴子村长》中的村长父亲、《鹿鸣》中养鹿人林明父亲、《狐啸》中的老铁头、《怀念狼》中的红岩寺老道士、《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最后一位酋长的90岁女人等，他们看尽了人生的风雪，积累的经验智慧让他们知道融入自然的必要性，他们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表达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生存哲理。

第二节 末世情怀

人与自然的冲突引发了自然生态危机，人与他人的冲突引发了社会生态危机，人与自我的冲突引发了精神生态危机。鉴于此，揭示重重生态危机，探寻危机的根源并进行批判、反思成为生态小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价值存在的关键。在新世纪的生态小说中，主要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引发的自然生态危机。这一特色表现为以末日式的预言警醒人类，如果人类再不觉悟，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小说中的悲剧将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

生态小说一般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批判对象，这也是其最有意义和价值的部分。“人类中心主义”在古希腊就已初见端倪，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普罗泰格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等，都在强调人的地位。到后来以笛卡尔为代表提出的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已根深蒂固。这曾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的象征，但飞速的文明步伐与自然发生了剧烈地冲突，人对自然进行“掠夺”，自然也对人进行了“回报”，但这“回报”代价惨痛，于是人类开始反省自己。18世纪，卢梭在《爱弥儿》中对人进行了批判：“凡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了坏了。”^③19世纪，恩格斯发

^①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② 雪漠：《狼祸：雪漠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8页。

^③ 【法】让·雅克·卢梭：《爱弥儿》，彭正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出了让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的警告。20世纪,生态学理论热潮正式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21世纪,在西方生态理论渐趋完善的过程中,中国的生态美学与生态小说也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对人欲望无限膨胀的批判

欲望,是人的本能,是人性之一,是人改造世界与自己的原始动力,从而也是人类进化、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动力。黑格尔也说:“假如没有欲望,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①虽然欲望能产生动力,但有一点值得反思的是,欲望的无限膨胀也会造成强大的破坏力量。随着人的无限欲望与自然的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作家也意识到以往吹捧的欲望动力理论有着致命的缺陷,它会使人陷入精神生态危机,因此在生态小说创作中,他们对人的过度欲望提出了批判。

雪漠在《狼祸》中描述了人类欲望造成的悲剧,牧人为了争草场,争一口井,不惜以命相搏,上演了一场场悲剧;盗猎者为了金钱,将狼赶尽杀绝,导致狼对人与羊群进行了血腥报复。小说题目虽说是狼祸,但作者借孟八爷之口说出悲剧的根源其实在于人,是人祸。孟八爷说:“那最大的威胁,不是狼,不是水,而是那颗蒙昧的心。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②孟八爷在道出危机根源的同时,也给人类指明了道路,只有改变人心,即遏制无限膨胀的欲望人类才能有出路。雪漠不仅在小说中表达了对欲望的批判,在《文学:流淌的灵魂——关于文学的对话》的采访中也对人类过度的欲望进行了批判,他说:“我眼中,除了生存的必须,别的需求,便是贪婪。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生命不息,欲望不止。但所有贪欲,都是罪恶的源泉。”^③

张炜在《刺猬歌》中塑造了一个充满贪欲的形象——唐童,他不仅贪财,还贪色。他为了开采金矿,炸了一座座山;为了建造紫烟大垒,毁了无数个村庄;为了得到美蒂的美色,威逼加利诱。围绕在唐童周围的人也都为了各自的欲望与之周旋,黄毛为了得到唐童的赏识,吹捧“民族如同火箭,欲望才是燃料”^④;监测矿产的女科学家为了金子,抛弃城里的丈夫委身于他;视察的领导到了唐童的集团却沉醉在金钱与美女的梦中;连村长也被房子、车子买通,成为唐童的走狗,任大垒的水流到河里、水库里,毒死鱼和庄稼。钱、权、色三者之间互相交易是常态,难怪美蒂提醒还沉浸在理想中的廖麦:

^① 转引自王诺:《“厄律西克同的神话”与欲望动力论批判》,《中国绿色时报》,2005年7月29日。

^② 雪漠:《狼祸:雪漠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26页。

^③ 雪漠:《狼祸:雪漠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24页。

^④ 张炜:《刺猬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2页。

“‘时代变了’，你知道现在的人满脑子都是钱，除了钱，再大的事儿都扔在脑后了。”^①无限的贪欲让山地和平原的人再也看不见丛林莽原，如同硫酸的金钱让性本善良的人心腐蚀殆尽。

现代人很多欣羡占有大量物质财富的“成功人士”，可探究他们的根底，就会发现他们消耗了大自然更多的资源，给大自然带来更多的污染，对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王勇刚，靠猎杀无人区的野生动物及开挖金矿发家致富，成为了西藏的“王”，每个人都对他礼让三分，他提供的丰厚税金，让区政府人员也不得不对他“关爱有加”，他成为众人心目中的“成功人士”。可是他依然不满足，还想开发李石柱用一生守护的最后一块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利诱无果的情况下，竟然纵容盗猎者用机枪把曾经共患难的战友扫射而死。物质的欲望让王勇刚已丧心病狂，达到变态的地步。在小说的最后，杜班长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角度批判了王勇刚的贪欲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他说：“王勇刚的金矿盲目开采，植被层被大量破坏，草地减少，野生动物不被猎杀也要被饿死。绿地沙漠化，又直接影响青藏高原，气候反常，干旱，暴风雪，沙暴屡屡发生，而青藏高原又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恶化又直接导致我国其他地方的自然环境恶化。”^②

新世纪生态小说中对欲望的批判大多以死亡或悲惨的结局预示生态的破坏，这样的悲剧结局正验证了鲁迅的悲剧定义，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这种毁灭在小说中是有意义的，不完美的结局更易引起人们的反思，这是悲剧的力量，也是生态小说美学思想价值所在。

二、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恩格斯说：“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③；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扮演着魔鬼的角色，对科学技术乐观地估计，对物质增长无限地贪求，使人类陷入种种危机，如核污染、高科技战争威胁、环境破坏等。

海德格尔认为：“当人类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④虽然不能如海德格尔这

^① 张炜：《刺猬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

^② 杜光辉：《我的可可西里》，选自《新世纪第一届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页。

^③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页。

^④ 【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样完全否定科学技术，但如今的科学技术异化已导致人类封闭了自己的路，断送子孙的路了。科技异化没有固定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使科学技术脱离了其本性。科技，本是按照人类的愿望造福于人类，但人类的短浅目光只顾及人类自身眼前的利益，使科技实践的对象在成为主体时就开始违背人类的意志，发展成为一种异己力量。卡逊在《寂静的春天》就对科技异化的破坏力量进行了描写，现代人类想用农药杀死对庄稼有害的虫子，使农民获得丰收，但是农药的残留侵入鱼类、鸟类、野生动物和家畜的体内，“或是在你吃饭桌子上的一杯水里都混入了化学家在实验室里没有责任想到要合成的化学药物”^①。

新世纪生态小说中对科技的异化批判也以悲情的力量让人们认识到现代的科技异化带给人与自然的伤害。当今的科学技术研究大多依附于权力与金钱集团，科研项目资助、科研经费投入、科研成果回报，这些巨大的利益吸引着科研者，让他们忘却科技的本性——造福自然和人类，趋之若鹜地为取得成就不顾一切代价。在《狼孩》中小龙弟弟的回家应该得到的是关心和爱护，但是医生、专家、动物学家、人兽学家打着给狼孩治疗的幌子，其实是来做实验和搞研究，想抢占千载难逢的论文一手资料，好使他们功成名就。最终的结果却是，尽管集中人类智慧的各学科专家使劲了十八般武艺，专家们的报告写了一沓又一沓，文章发表一篇又一篇，但狼孩依然如故，倒是成就了好几位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可怜的小龙成了他们名利双收的试验品，成了挖不完的金矿。

欧美电影中经常出现核污染、生化武器等导致人与动植物变异造成的人类末日的主题，虽然电影的情节是杜撰的，但是从中还是能够体悟现代科技的发展是很有可能导致物种的变异，具备将整个地球的所有生命彻底毁灭的威力。（如《生化危机》）《太平狗》中通过一只名叫太平的狗去观看人世百态，其中太平为救主人程大种在空气中充满怪味、河里灌满黑水的工厂旁“蓄势待发”，它看到湖里漂满死鱼、死猫、死猪，而且变异的老鼠状如大猫，并且还准备在洞里围歼太平，试图吃掉它。太平还看见自己的主人程大种和工友病倒，身上长出冒黄水的疮，散发恶臭，脚趾时常被大老鼠啃咬，最后七窍流血而死，连耳朵都被啃没了。从“胆小如鼠”这一成语中能够推断老鼠是生性怕人的，可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已使老鼠明目张胆的吃人，而造成这一悲剧的，不是老鼠的自然进化，而是人类的科技异化。张炜在《刺猬歌》中也描述过类似的场景，唐童建造的紫烟大垒，整天冒着烟，散发着“屁味”，大垒的工人每月都有人中毒或自杀，死者家属找来的，给点赔偿金，不找的，就偷偷埋掉，老百姓用血汗拌水泥，白骨当砖头砌成

^①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了紫烟大垒。

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生态小说中危机揭示并不是作者的呓语，它是对未来的预言，对人类的警醒。假如人类不重视科技异化造成的生态危机，小说中的悲剧就是现实的写照。事实就是如此，据2014年12月6日腾讯新闻报道：“湖南桃源高污染项目致橘子变异，10余村民患癌症死亡”^①。桃源县曾是生态环境优美的地方，但在2003年4月，晟通集团在此建立和发展成铝厂、阳极和电厂等多个子公司，如今翠绿的丘陵里高耸着多个晾水塔和烟囱，刺鼻的气味、浓浓的白烟在空气中散发着。而这些导致当地村民十几口人相继癌症去世，还有很多人身体虚弱，无缘无故的全身酸疼无力，进医院却查不出什么病来，连当地的橘子表面都长出一个一个小瘤子。面对和生态小说中虚构情景如出一辙的现实，在惊叹生态作家们的先见之明之时，人类是否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让生态作家笔下的悲剧预言不要再一一成为现实。

三、对城市文明的批判

城市本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筑起的更加坚固、更加安全、更加便利的家园，这是人类告别野蛮走向文明的象征，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在城市化的世界潮流中，中国只注重硬环境的建设，比着高楼大厦的数量、比着造桥开路的宽度、比着建设广场的面积、比着修建地铁的长度等，却忽视了软环境的建设，如忽视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建设、绿化的建设，环境的保护等。美国城市研究专家詹姆斯·特拉菲尔说：“科技改变城市面貌，欲望则铸造城市的品格。”^②科技的异化、欲望的膨胀已让城市变成建立在精神废墟上的一座座高楼大厦，这无疑是人类的悲剧，精神生态的灾难。

余谋昌在《生态文化理论阐释》中把人与自然的空间分为三类：荒野、农村、城市。从上文的论述来看，新世纪生态小说主要把笔墨集中放在荒野与农村当中，但这并不代表不涉及城市，“城市”隐含在行文当中，与荒野、农村构成对立面而存在，生态作家无一不持“否定城市”的观点，他们通过用象征人与自然和谐的荒野、农村被城市文明的弊病所侵占来批判城市。

城市在生态作家笔下常常是罪恶代名词。他们认为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农村劳动资源掠夺的基础之上的。《空山》中机村本是藏族的一个僻静村庄，但当城市为了建造“万岁宫”而大举进军机村，修路开山炮声响彻山谷，城市伐木工人不断

^① http://news.ifeng.com/a/20141207/42662048_0.shtml “湖南桃源高污染项目致橘子变异，10余村民患癌症死亡”。

^② 转引自海默：《为什么“骂”城市？》，《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第14版。

进出机村，整整一个冬天砍去一面山坡的树木，早已远远超过过去机村人砍树的总和，但是运木材的汽车还是不断地涌进村来，一座座山上的上好桦树被切断送进城里。最后机村在一场天火中几近毁灭，而城市工程师不关心机村人的生存，却在纸上演算“大火只让森林损失了不到百分之十的好木材，与此同时，大火却预做了清理场地的工作，使今后的伐木功效提高两倍以上”^①。这种不顾机村人死活以及对自然资源强取豪夺的行径跟强盗已无区别。陈应松也在《松鸦为什么鸣叫》中揭露了城市对农村资源与劳动力的掠夺。县里要在红旗岩建路，伯纬和王皋是被村里推出的两个壮劳力，他们被分去背炸药、雷管去炸岩，整天在悬崖上吊着过日子。他们去的第二天就目睹被炸飞的六个人的肉贴满对面的崖壁，树上挂着炸飞的脑袋、膀子、腿，接着松鸦就铺天盖地的飞来，到此，松鸦为什么鸣叫也得到解释。等路修完，王皋炸没了半个头，伯纬炸残了双手，可这只是刚刚开始，后来“神农架山区的山好像矮了。那不是矮了，是因为参天大树都被砍光了……在山壁上，在河沿上，先是拖木材的车，后是拖门方的车，拖木炭的车……”^②拖走的是资源，留给神农架山区的是暴雨，泥石流，干旱，雪变小、推迟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城市就在这炸山修路的背后暴露了它与自然冲突，与人冲突的罪恶。

当然，新世纪生态小说也有把对城市文明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城市的。赵本夫就在《无土时代》中对城市文明的扩张进行了预言，预言人类将经历一个“无土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与自然对立、人与人冲突。小说虚构了一个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木城，这“木”其实有麻木之意，寓意城市人远离自然导致的精神麻木与空虚，在木城中文明的弊病包括身体和精神上的，“厌食症、肥胖症、高血压、性无能、秃顶、肺病、肝病、癌变，以及无精打采、焦虑失眠、精神失常、疑神疑鬼、心理阴暗、造谣诬陷、互相攻讦、窥视……”^③，大地虽是“一个能吸纳、包容、消解万物的无与伦比的巨大磁场”^④，但城市中的钢筋水泥阻断了与大地的接触，因此各种污浊之气就没法排解。“城市是人类最大的败笔，城市是生长在大地上的恶性肿瘤，城市并不是个值得羡慕的地方”^⑤，作者借柴门之口说出了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希望人们扒开水泥，回到土地中来，回归生命与精神的土地，重建人类的精神家园。

^① 阿来：《空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② 陈应松：《陈应松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③ 赵本夫：《无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④ 赵本夫：《无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⑤ 赵本夫：《无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第三节 生态理想

理想不是欲望，是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欲望单单追求物质，而理想诉诸物质与精神的双向满足。列夫·托尔斯泰说：“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①理想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生态作家勇于生态危机时代的担当，用生态小说倾诉自己的生态理想。也许他们的期待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过于理想，但是，他们在理想诉求中也常常提出有见地的观点，为建设和谐平衡的生态家园作出一份贡献。

一、自然的复魅

“魅”字由“鬼”和“未”联合，本义指貌美的鬼，后引申为鬼魅、精怪、狐妖等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神秘力量。这是由于远古时期科技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现象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解释，于是就把神灵鬼怪附在神秘的自然现象上，因此有了“魅”，表达了人类对神秘自然的敬畏意识与恐惧之感。“复魅”是相对于“祛魅”来说的，工业社会时代，科技迅速发展，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得到很大地提高，自然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人类开始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相信依靠科技的力量无所不能，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世界的祛魅”。“祛魅”用理性科技祛除了人类愚昧落后的思想，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得以跃上新的阶段。但是，它也祛除了人类心中对自然的敬畏与信仰，使人类自以为是世界的主宰，开始对自然肆无忌惮地掠夺，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作为反驳，很多生态学者呼吁自然的复魅或返魅。复魅，是否就是重新回到远古时期对“魅”的迷信呢？其实不是，“它并不是号召将世界重新神秘化，事实上，它要求打破人与自然间人为的界限，使人们认识到两者都是通过时间之箭而构造起来的单一宇宙的一部分”^②。简而言之，就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构，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让人类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普通一员，重新寻回自然的魅力。

恢复自然本性，是生态小说创作者们的共同理想。而以复魅的方式让自然回到本性，可以使小说有了权威性与合法性的传统文化精神资源的支持。因此，在新世纪的生态小说中，自然的复魅就成了实现创作者生态理想的途径之一。在此，自然的复魅主要有两种方式：含魅形象的塑造和含魅行为的描写。

含魅形象主要是指灵异魅性色彩的动物。生态小说中主要通过塑造聪明智慧，通晓情理，知恩图报，能感应自然的神性动物来表达对魅性自然的崇拜。《老虎大福》中能

^① <http://www.oh100.com/a/201205/84560.html> “理想信念格言”。

^②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与人类二福感应的老虎,《黑鱼千岁》中为同伴复仇并同人类玉石俱焚的黑鱼,《银狐》中能迷失人类心智但善恶分明的白狐,《鹿鸣》中能够感知危险的头鹿峰峰……这一系列超越人类理解力的魅性动物塑造,一方面意在揭示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科技理性并不是全能的,自然拥有其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然的神秘感,恢复自然的审美性;另一方面,把自然中的动物神秘化会使人类产生惊奇感与崇拜感,有助于为自然增添奇特魅力,激发人类潜藏在心中的对自然的崇拜意识。

含魅行为,主要是指信仰宗教的行为。新世纪生态小说主要通过对本民族传统宗教的重新解读,吸纳本民族宗教中对自然敬畏和信仰的内容,并侧重展示与生态保护息息相关的部分,从而希望人类在敬畏自然、感应自然的基础上维护生态平衡,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众多生态小说中,萨满教的理论根基——万物有灵让其受到热捧。萨满教是原生性宗教,原始于渔猎时代,以崇奉氏族或部落的祖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为主要内容。崇拜对象主要有各种神灵、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它曾经长期盛行于我国北方各民族。萨满教常用人格化的想象赋予火、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云雾冰雪和某些动物以神秘化的灵性,并认为人类的意志、愿望和情欲同样存在于这些神秘灵性事物的身上,他们也有善恶之分,不能违反和触犯。

虽然萨满教曾被归入非理性的、愚昧落后的迷信之中,遭到其它有组织、规范化的宗教代替,或是被现代文明理性所压制、唾弃,但是,新世纪生态小说创作者们在重生态危机中与萨满教产生了共鸣。郭雪波的《银狐》《狐啸》中提到的萨满教“孛”师老双阳,为保护草原,运用法力与贵族王爷展开生死角逐;为研究萨满教文化被下放的白尔泰、萨满教唯一继承人老铁子,他们与狐狸共隐大漠,达到“天地人兽”合一。《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则详细地描述了神奇的萨满教行为,萨满巫师,人神之间的通灵者,担负着祭神治病、消除灾祸以及祈求生产丰收与狩猎成功的职责。尼都萨满跳神给驯鹿治病,还消除日本人吉田腿上的伤以及救活已经奄奄一息的战马,使日本人都惊叹不已;妮浩萨满跳神救三个孩子,为不违背天神的意愿用自己的三个孩子换取别人的生命。鄂温克族萨满教还对大树、熊、火进行祭拜,他们死后实行树葬,对树尊敬,不乱砍伐树木,只挑枯树使用;他们猎熊,但吃熊时举行一定的仪式,不乱扔熊骨;他们崇敬火神,火神带给他们光明与温暖,他们祖辈都保持火不熄灭的习惯。图腾崇拜也是萨满教的一个仪式,《狼图腾》中对狼图腾的崇拜,实质是对藏族萨满教长生天腾格里的崇拜,因为“狼是腾格里派来的”,因此,他们信奉腾格里,保护草原,保持生态平衡;他们实行天葬,不把狼赶尽杀绝,由狼把人的灵魂带上天。

无论是灵异魅性动物，还是神圣萨满教，看似古老而虚拟，但是生态创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让人去崇拜动物或复归萨满教，而是希望通过笔下的魅性自然的描写让人类善待自然，期待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能够以一种敬畏之心、神圣之情、虔诚态度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位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二、肉体与精神的返乡

在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返乡”是永不衰竭的主题，20世纪以来，返乡主题形成一股宏大的文学流向，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城市化不断扩大，人们越来越多的抛弃家乡，涌进城里，建设城市，但他们却成不了城市的主人，只能是“城市的异乡人”，精神矛盾、社会矛盾在城乡中不断上演，与此同时，家乡故园的自然环境也在不断地遭破坏，因此，重重生态危机进入新世纪文学创作者的视野，“返乡”成为他们化解矛盾的理想办法。

“返乡”在新世纪生态小说中多以死亡来化解悲剧的矛盾冲突，一方面是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对人与自然的伤害；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返乡的重要性，落叶归根，至死不忘故乡。《高兴》中进城打工的五富，经常闹着回乡，最后由刘高兴背着他的尸体返乡；《松鸦为什么鸣叫》中时常思念家乡妻儿的王皋意外死亡，由伯纬背着尸体返乡；《太平狗》中程大种虽客死异乡，但他的狗带着他的灵魂寻回了家乡；《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画家伊莲娜时常因厌烦城市充满压力的生活而回到山中，最后也在完成一幅巨作之后投入大河的怀抱，回到自然的家乡。

新世纪生态小说中的“返乡”不仅指重返故乡，也指重返自然家园，并且，返乡的不仅是肉体上而且也是精神上。其实，“返乡”也就是通过返乡这一途径，让人们在自然环境破坏、精神焦虑、社会矛盾中产生的失去家园的茫然之感消失，重新回到“大地朗照着的‘家园’”^①，重构人与自然家园的关系。《刺猬歌》中的主人公廖麦从小被土匪恶霸唐童父子逼迫离乡，虽在城市中隐姓埋名的日子过得不错，但是他不断地冒着生命危险返乡，因为家乡的那个地方，有他深爱的妻子、可爱的女儿，还有陪伴他成长的丛林与野兽。海德格尔说：“每个人都在回乡的路上，故乡却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当廖麦回到故乡，回到妻女身旁，故乡却不是原来的模样，唐童集团的炸山挖金矿，毁林垦地建大垒，家乡没了丛林野兽，妻子向唐童妥协，女儿认仇人作父，于是，廖麦把返乡之路寄托在“晴耕雨读”的理想生活之上，达到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返乡。虽然小说结尾廖麦被逼迫再一次离乡，形成遗憾的、悲惨的结局，但是这正说明了，仅靠部分人的“返

^①【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页。

乡”是不行的，需要人类共同认识到返回自然家园的重要性，否则人类的悲剧就如同小说一样，不断被逼迫离乡，最后没有立足之地。

生态小说的创作者不仅在小说中表达了他们的“返乡”理想，他们自己也用实际的行为寻找“返乡”的价值。2000年，陈应松离开城市到神农架林区体验生活，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也搜集了大量素材，写出了《豹子最后的舞蹈》，从思想到艺术都堪称佳作，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叶广苓，在新世纪初，曾到秦岭深处的陕西周至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她到职后并不是过着办公室的“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干部生活，而是长期蹲点秦岭腹地，“常在林木葱郁的动物保护区内居住，那里没有电，没有任何通讯设施，人、动物、自然三者的交流处于一种非常本原的状态。她常常在不假言说的造化之美中，审视自身、悲悯一切生命。”^①正是这样，她写出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老虎大福》、《猴子村长》、《黑鱼千岁》等一系列小说。还有阿来，以原乡人身份“行走西藏”的行走写作，写出《空山》三部曲；迟子建为写一部关于鄂温克族的生态生存小说，回到了大兴安岭做田野调查，去熟悉那里的山林，熟悉那里的宗教——萨满教，这也使得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荣获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总之，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返乡是必要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家乡的山川草木，家乡的风土人情，还有那血溶于水的亲情，这些都是人类成长必要的精神滋养，也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因此，返回自己的家乡，呵护自己的家园，重返淳朴的本性，成为新世纪生态小说的理想诉求。

^①殷慧芬：《最是书香能致远》，《上海金融报》，2004年7月22日。

第三章 对小说中生态美学思想的评价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生态小说在新世纪以来取得的成就不可小觑，它较新世纪以前的生态小说创作有了较大的进步，它所体现的生态美学思想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是，生态文学创作还是一种新兴的潮流，其根基还没有扎实，因此，还处于发展阶段的新世纪生态小说依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

第一节 小说中生态美学思想的价值

美学的价值在于能推动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不仅对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能够在全社会进行美育，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意识，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审美能力，从而改造社会，完善人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生态美学成长于生态学与美学的结合点上，其美学思想除了体现美学的价值以外，还在人和自然关系方面的思考体现了一种智慧，一种发展的眼光。

一、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弘扬

汉斯·萨克塞在《生态哲学》中分析了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思维模式，他认为西方“为了尽可能准确、客观地认识这件事，人们用抽象的方法把它从一系列事件中分离出来，加以分析、有目的地细致地研究。人们也称这种方法为分析”^①。而中国“一切存在之物的两极性结构如同一个基本模式被视为先决条件，但对于感官来说事物不是两极性，而总是只展现出一个方面……这种思维方式以整体为目标，所以被称为整体思维”^②。分析思维决定了西方美学总是孤立地看待事物，把世界分为碎片进行研究，虽成果一度丰硕，但其将自然作为征服对象进行研究时，对自然背离的西方美学也就逐步走向了困境，使人类盲目自信，陷入生态危机。而整体思维决定了中国传统美学对事物有更加广泛深入的了解，对宇宙万物生命进行整体思考，在人与自然的表达中表达一种平等对立的倾向。这一点与当下盛行的生态理论“生态整体主义”原则不谋而合，体现了中国传统生态审美的智慧。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能够体现生态审美智慧的，主要集中在儒、道、释三家美学思想之中。其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几乎统领儒、道、释三家，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

^①【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②【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的思想。《狼图腾》中提出的“天地人草合一”的思想就是其变异的形式。虽然在“天人合一”的关系中，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侧重社会生态的平衡；道家强调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和谐相处，侧重自然生态的平衡；佛家讲究“佛心”“清净心”，强调人自身的修身养性，侧重精神生态的平衡。但是，儒、道、释三家仍然以“天”为主，都注重自然、社会、人三者和谐统一关系，是一种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生态审美智慧。

新世纪生态小说中对自然复魅的生态理想表达实质就是希望人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这在儒家思想中早有体现，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反对民间巫术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他却对自然怀有一份敬畏之情，他在《论语·季氏》中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①把对自然之天的敬畏排在首位，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对自然客观规律的遵从，不违背自然之意。

道家思想的避世思想曾一度让人认为它是消极的，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它的价值与意义越来越显示其独特性，老子有一段著名的言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天、地、人、道，人只是其中一员，这就确定了人在宇宙中与其它万物平等的地位，没有贵贱之分，没有中心之论，而最终“道法自然”，意在一切要遵循自然之规律，顺应自然。庄子的“心斋”“坐忘”等思想对人的精神世界提出了要求，让人们忘却物欲的追求、世事的纷扰、权欲的贪恋，达到一种“澄净”的状态。这些都是20世纪之后工业现代化中被遗忘的优秀生态智慧，而人们只记着以世界主宰者的身份用现代科技征服自然、肆意改造自然，并为欲望的满足不择手段，这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21世纪，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在生态文学中用生态的语言表达传统的生态智慧，对中国的传统生态智慧起到了弘扬的作用。

佛教是印度传统文化，但传入中国后，已逐步中国化，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关哲理，形成了中国的佛教，尤其是唐代中期以后的禅宗，其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态智慧也应成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组成部分。它的“众生平等”思想拓展了伦理的范围，确立了世间万物的平等观念；它的以“勿杀生”为五戒之首思想，引导了人们善待自然、善待生命；它的“善恶业报”思想力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鼓励人们一心向善；它的“贪、嗔、痴”三毒理论，劝诫人们少欲知足，回归本性。新世纪生态小说正是弘扬了这种生态智慧，作品中既有描写善良本性对自然的善待，也有对人的贪欲

^① 邹懋：《论语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48页。

^② 郑伯森：《老子释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

的批判以及对自然的掠夺而被自然报复的“善恶业报”思想的表达。

二、对当下生存困境的启示

20世纪末，生态问题层出不穷，威胁着当下人类的生存，人们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新世纪的生态小说所展现的生态美学思想明确地告诉人们：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平等共生才能摆脱困境，才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具体地讲，小说中的生态美学思想对当下生存困境的启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构新的世界观。世界观也叫宇宙观，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观点看法。在近三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牛顿—笛卡尔机械论世界观，指导了现代科学的进步和工业化的发展，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种世界观把世界看做是一台机器，并把它分割成无数的部件，人们认识了解世界就是通过这些零部件，虽然这样的方式可以深化、精确化对世界的认识，但是，它严重妨碍了人们对整个统一的世界的认识，并且，让人与世界二元分离和独立，把世界作为对象进行征服、掠夺、统治，这就造成了各种生态危机频发。因此，这种世界观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要求，需要找到更可信的世界观来指导人们认识世界。生态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取代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应该是整体论世界观，即生态世界观^①。这一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生命，有思维，有精神的整体。新世纪生态小说“自然取向”中力推“万物有灵”、人与自然相互感应、人与自然平等的观点就是一种生态的世界观。而针对当下人们对自然掠夺的恶劣行径，生态小说的创作者们也用毁灭的形式来警戒人们，并且启示人们要解决当下生存困境的方法只有重新建构人们的世界观，让人们认识到，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人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只有与其它部分和谐共处，才能得以长存。

其次，重塑正确人生观。人生观指对人生的看法，即是人对于人生的价值、意义以及个人立身处世的态度看法或见解，包括生死观、荣辱观、苦乐观、幸福观等。新世纪生态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生态破坏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拥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把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过程当成生活的全部，并极力追求感官快乐，在他们看来，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自己能最大限度地享受物质生活。王勇刚的“今日有酒今日醉，哪怕明日炕上睡……什么地球未来，人类未来，轮不到我们这些人来思考”^②的人生观让无人区生态环境破坏殆尽；包顺贵“一代人管一代事，下一代我就不管了”^③的人生观让额仑草原沙漠化；唐童金钱至上的人生观让莽原丛林消失得无影无踪。相反，新世纪生态

^① 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② 杜光辉：《我的可可西里》，选自《新世纪第一届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2008年版，第333页。

^③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小说中塑造的生态护卫者形象，用无私奉献的人生观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少女拉姆宁愿被盗猎者糟蹋也不放弃保护手中的八叉鹿；退伍兵李石柱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用一生以及生命守护无人区最后一块净土；养鹿人林明的父亲为救一头种鹿与偷猎者生死对决，最后跟随种鹿跳入悬崖；猴子村长为救一群猴子假扮猴子被村人群殴。面对当下重重的生态危机，应该反思人类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它造成的生态灾难已经严重威胁人的生存，而生态护卫者用无私奉献的人生观保护了自然家园。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错误的人生观毁灭自然家园，正确的人生观可以拯救自然、呵护人类生存的家园，让人类可持续发展下去。

最后，树立生态价值观。这里的生态价值观主要是自然价值观。关于自然是否有价值的问题，在过去的争论里，有些人认为只有主体的人具有价值，离开人的世界毫无价值可言。有些人认为自然具有价值，可以为人类所利用，即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20世纪中叶，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让这两种价值观失去了立足点。随之而来的是生态伦理学家们提出的生态价值观，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有内在价值。所谓“外在价值”，“是从人和其他生命的角度，自然界对人和其他生命的有用性，即它作为他物的资源、手段或工具的价值。”^①所谓“内在价值”，“是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按照一定的自然程序（自然规律）自我维持、自我组织和不断生产，自为地进行自己的生命活动，以自己的形式表达自己，是独立于人类的价值。”^②德国哲学家尤纳斯认为，内在价值观的树立首先来自于对生命的肯定。新世纪生态小说对动物的生态审美时，不仅关注了其外在价值，而且强调了其内在价值，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肯定了动物生存的权力、自由的权力、爱的权力，以及它们在生存发展中用自有的道德处事方法表达自己的权力。这一生态价值观让自然既有自身存在的权力，又有利于他者的“义务”，使自然和人共处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相互协作。因此，只有树立生态价值观，新世纪生态小说中描写人与动物相互感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奇景才会在现实中实现。

第二节 小说中生态美学思想的不足

一、倾向现实危机展示，疏于危机根源探究

新世纪，我国生态小说发挥着文学的社会参与功能，对当下的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

^① 钱俊生、余谋昌：《生态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② 钱俊生、余谋昌：《生态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批判与反思，对国人的生态意识唤醒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生态小说热衷于全方位展示当下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注重对生态事实的摹写，执着于素材的真实来源，甚至有些作品以写实的笔调贯穿始终，虽然这在警示人们的层面上具有一定的效应，但其过于明显的目的性，不仅消解了文学应有的审美距离，而且使对危机的根源探究显得单薄和不成熟。

论及生态小说疏于危机根源探究的缘由，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的生态小说创作缺乏生态理论熏陶，创作者们的生态美学思想大都来源于实践性地感悟，因此，生态意识不自觉，很少能达到深层生态思想的高度。如叶广苓对动物的生命意识感悟，完全来源于她任职周至县时的日常经验，她的叙事基本都有事实依据，《猴子村长》中母猴在猎人枪口下从容不迫喂奶的情节，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位自然保护区的专家所遇到并讲给她听的；杜光辉早年被派往青藏无人区，其亲身经历让他在《哦，我的可可西里》里的纪实笔调与新闻报道十分相似；姜戎，30多年前，自愿到额仑草原插队，钻狼洞，掏狼崽，养小狼，与狼战斗，每一项的经历都在《狼图腾》一一再现。他们用真实的生态事件呼吁人们停止破坏自然，却忘了寻找这一破坏行为的根源，即使作品力图去思考和探究，但缺乏全面的生态整体观，使他们的生态视野出现偏狭。叶广苓探寻了许多动物消失原因，在诸多原因中强调了人类“无所不吃”的饮食文化，《猴子村长》中抓猴的原因就是人们喜欢吸食活猴的脑髓，她说：“人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弄到自己的嘴里去，包括婴儿的胎盘和自产的尿，遇到任何物种，首先刺激人的就是食欲，这点以中国人为最。”^①杜光辉虽然在《哦，我的可可西里》中借石技术员之口论述对青藏高原自然破坏会导致一系列其它地区的自然破坏，表达了其生态的整体主义思想，但是，他对造成生态根源的危机归咎于王勇刚一类人的贪欲，这未免有失偏颇。姜戎在《狼图腾》中讲完所有故事之后，才在尾声部分探讨了造成额仑草原沙化的原因，“中国没有竞争选拔人才的科学民主机制，耿直的优秀人才总被压在下面……体制黄沙比草原黄沙更可怕”^②。诸如此类，还有把城市文明、科技等纳入危机根源的探究，但这些仅触及表面和部分的原因，很少有生态小说能够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制度等层面全面的思考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雷同式的生态美学思想表达

生态小说在新世纪出现了“井喷”现象，虽然都意在传达生态思想，但其表达方式程式化，经常出现不同作家的作品故事框架雷同，只是换个人物、地点、事件，让读者

^① 叶广苓：《老县城》，《中国作家》，2003年第1期，第97页。

^②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很难对生态思想有持续深入的认识。这种雷同式的表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城恶乡善模式化。纵观新世纪的生态小说,城恶乡善的模式普遍存在其中。作品中,大多数的城市是欲望、罪恶滋生的地方,而乡村是诗意的栖居地。城市中的人长期远离自然,城中的生活、工作、学习压力无法排解,人们变得麻木、冷漠、贪婪、焦躁、自私,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生态危机。而且,城市还是乡村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因此,《无土时代》中的木城充斥着麻木与勾心斗角;《高兴》中的西安城的人看民工跳楼像看耍猴;《空山》中的城市砍伐工人对杀戮动物和砍伐树木乐此不疲;《太平狗》中城市人对农村亲戚六亲不认……相反,在乡村,青山秀水孕育淳朴善良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互利共存的和谐关系。因此,回归乡村,回归土地,回归自然的呐喊成为生态小说创作者们生态理想。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我和高兴》中写道:“我虽然在城市里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意识,却仍然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①城市文明的弊病固然对生态造成了破坏,但是生态小说的创作者如此一致的对城市嫌弃就显得过于极端与主观。同时,也显示出矛盾的地方,作家们都呐喊离开城市,回归乡土,可是有几个作家真正回到乡下创作?他们都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愤怒地批判城市。而且,他们也忘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就是来自宋元城市的发展。

第二,悲剧审美普泛化。新世纪生态小说中的悲剧审美主要是指作品中把有价值的事物摧毁,希望引起人们悲悯、痛惜、感伤的情怀,并借此激发人们去反思、深省。作品中常常出现大自然和生态美好形象被无情毁灭,从而来谴责人类中心思想和愚蠢行径。其主要运用两个程式进行悲剧审美,一是挽歌式的“最后一个”表达,作品中常塑造“最后一个”的形象来鞭挞人类对生态破坏的恶劣行为,如叶广苓《老虎大福》中的最后一只老虎大福被乱棍打死;陈应松《豹子的最后舞蹈》中最后一只孤独的豹子,整日回忆着悲惨的家族灭亡史;李克威《中国虎》中最后一只华南虎为救斯蒂文而被卷入泥石流;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坚持留守山林……众多反复的“最后一个”虽可以引起读者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小说是一门创造性的想象艺术,如此腔调一致的最后警告,会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二是频繁使用死亡主题,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叶广苓的秦岭系列、郭雪波的大漠系列、阿来的西藏村庄系列等新世纪生态小说无一不涉及死亡,或是人物的死,或是自然界动植物的死,作者都怀着激愤之情以死亡来渲染悲剧气氛。在这里,死亡一方面寓意着生态毁灭,另一方面也寓意着只有死亡才能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确,无论是对“最后一个”挽歌式哀唱,还

^① 贾平凹:《高兴》,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页。

是对死亡结局的激愤呐喊，悲剧审美能让作者的忧患之心、反思之情更能震撼人心，激发思考，“但是这种清一色的呼天抢地的悲哭，悲剧的哲学意蕴升华还显得的功力不足，悲情之外触摸不到深层的生态哲理幽思”^①。所以，这种普泛化的悲剧审美使新世纪生态小说停驻在保护自然的浅层生态思想的训导宣传上，不仅让其缺乏哲学的、历史的深度思考，还减退了文学的艺术魅力。

第三，形象塑造趋同化。小说取材于生活，它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揭示人类的精神世界，展示一定的时代观念……而这些都离不开小说对形象的塑造，经典的形象塑造可以让小说大放光彩，如哈姆雷特、郝思嘉、阿Q、祥子等。但纵观新世纪生态小说，具有立体感、新奇感、独特感、艺术感的形象并不多，出现了不同作者的作品塑造的形象趋同化。基本上每一篇生态小说都在塑造三类形象：生态破坏者、生态护卫者、生态受害者。《狼图腾》中的生态破坏者——包顺贵，生态护卫者——毕利格老人，生态受害者——狼与草原；《刺猬歌》中的生态破坏者——唐童，生态护卫者——廖麦、“兔子”，生态受害者——丛林动物；《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生态破坏者——王勇刚，生态护卫者——李石柱、石技术员，生态受害者——无人区野生动物；《鹿鸣》中生态破坏者——野食研究会、追捕队，生态护卫者——林明，生态受害者——鹿群……这些形象就如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工艺品，具有表达生态思想的鲜亮外壳，却没有深度内涵的经典特色。卡尔维诺说：“今天，我们受大量相似形象的疲劳轰炸……记忆中被塞满了乱七八糟的形象片段，像一大堆垃圾一样，在如此众多形体中间越来越不可能有哪一个实体能够实现出来。”^②因此，新世纪生态小说形象的趋同化让每一部作品变得大同小异，而依附形象展现的生态美学思想观念就会让读者失去新鲜感，看一部作品就可以了解这十几年来的生态小说概貌，读者何必去浪费时间再看一部一样的作品呢。

新世纪生态小说的缺陷并不影响其存在的价值，卡塔萨尔说：“文学……是为了提出问题，引起不安，为真实的新的前景敞开智力和感觉。”^③因此，新世纪生态小说中疏于危机根源的探寻与生态思想表达上的技术欠缺，并不会影响在生态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开拓者们保护自然、尊重生命的赤诚之心，并且，他们借作品表达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美学思想也是其他类型的作品无可比拟的。另外，无论是我国的本土理论生态美学，还是生态文学，两者都在成长的起步阶段，笔者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会对自身的不完善都会改正，以全新的姿态吸引世人的关注。

当然，笔者认为，要想让生态小说的创作走出迷误，让生态美学思想有更完美的表

^① 雷鸣：《当代生态小说审美迷津》，《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第40页。

^② 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③ 转引自王静：《人与自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达，创作者们除了把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当地基以及有意识的加强对生态理论的学习和辅以艺术想象力的翅膀，还需走出钢筋水泥的城市大厦，到淳朴澄净的自然中去感悟。这样，生态小说的创作者在造像写意时，能让读者成为游人，欣赏奇特经典之象；在借景抒情时，能让读者成为诗人，领略诗意地栖居之情；在深沉思辨之时，能让读者成为哲人，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理。

结 语

辉煌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幸福，也带来了灾难，人类在享受幸福的同时也被生态危机导致的一系列灾难侵蚀。自然生态危机让人类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社会生态危机让人与人的相处矛盾冲突不断，精神生态危机让个体沉陷在畸形的心理精神状态。面对各种频现的生态危机，人们要么就依然追捧经济发展的速度而继续沉醉，要么就在反思沉痛灾难的根源中觉醒。令人欣慰的是，人们没有继续不作为，从个人到团体再到国家都意识到了生态问题，并都在为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努力，“保护生态”成为当今社会的最强音。

自20世纪末生态的热潮席卷整个世界时，中国也在现实的自然环境灾难面前加入了这一浪潮。中国最先加入这一浪潮的是人文精神领域，生态文学的创作实践，生态美学的学科建立，生态哲学的思考与研究等等，都在反思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导致的生态危机，希望用“生态整体主义”观建立一个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生态小说所体现的生态美学思想就强烈地表达了这一愿望，它用回望曾经和谐自然的家园来反思自己的破坏行为，用末日式的悲剧故事来警告人们的短浅之见，用富有诗意的审美理想寄托生态和谐的愿望。虽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新世纪的生态小说创作在表达生态美学方面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但它在弘扬我国古代优秀的生态智慧以及对当下的生存困境启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新世纪的生态小说创作者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呐喊出他们对生态危机的忧思，呐喊出他们对生态和谐的愿望。也许个体的力量比较微薄，但是无数的个体结合就会有无穷的力量，而有时个体带来的影响并不总是那么单薄。如著名的央视记者柴静对于环境的关注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5年初，柴静在离开央视一年后自费拍摄调查雾霾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仅一天的时间，这一长达103分钟56秒的调查纪录片在网络视频平台的总播放量迅速突破1.17亿，在微博上有1.6亿的阅读量，掀起了一场指尖上的传播风暴。对于柴静的行为大众讨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其为大气污染寻找根源及解决方法的勇气值得赞赏，有人则认为其选择拍摄雾霾是出于“私人恩怨”或是为了“哗众取宠”。无论柴静是出于何种目的，她追求真理的社会责任和呼吁人们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是不容忽视的。柴静作为一个人类个体不会是人类的主流，雾霾也不是仅靠其个人所能扭转的，但此时个人的影响却超过了环保部门，连新任环保部长在看完其纪录片后也发短信对其

从公众和健康的特殊视角，唤起公众对环境的关注表示感谢。社会共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但却是体现在一朝一夕的细节上的。因此，对于生态的保护，我们不能忽视每一份像生态文学创作者和柴静这些个体的微薄力量，他们也许“势单力薄”，但为建设人类美好家园的每一颗赤诚之心都能迸发出无穷力量。

当然，在中国，为和谐生态努力的也不仅仅有个体的力量，国家也在体制、政策、法规等方面做出了调整，继把“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政治报告以来，对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一直是国家的关注热点。最近的2015年国家两会对于生态的关注持续升温，连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④国家已表明壮士断腕的决心，相信定能“言必行，行必果”。

总之，无论国家还是个体，在共同呵护生态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前行的决心不变，人类会与自然和谐地共处在地球之上。而中国新世纪的生态小说所表现的生态美学思想尽管是浅层的，不够全面的，但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未来的生态小说也肯定能展现新的时代风貌，并且表现的内容更全面，思想更深刻。

^④ http://news.ifeng.com/a/20150306/43287397_0.shtml “习近平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 【德】汉斯·萨克斯：《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 余谋昌：《生态哲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孙周兴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6. 【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7. 钱俊生、余谋昌：《生态哲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
8. 鲁枢元：《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9. 张华：《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10.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11. 盖光：《文艺生态审美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 张艳梅、蒋学杰、吴景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 王晓华：《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 岳友熙：《生态环境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 韩德信：《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回顾与向生态文艺学的转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6. 袁鼎生、龚丽娟：《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 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 李应雪：《自然·女性·栖居：罗伯特·弗洛斯特诗歌中的生态美学》，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 【美】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1. 刘彦顺：《生态美学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2. 党圣元、刘瑞弘：《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出版。
23. 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年出版。
24. 宁梅：《生态批评与文化重建——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25.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26. 曾繁仁：《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
27. 李长中：《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版。
28. 王长顺：《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
29. 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30. 刘定平：《生态价值取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
31. 王育烽：《生态批评视域下的美国现当代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32. 薛建明、仇桂且：《生态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转型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 年版。
33. 吴景明：《生态批评视野中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

二、期刊论文：

1. 刘恒健：《论生态美学的本源性——生态美学：一种新的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2 期。
2. 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3. 张玉能：《实践美学与生态美学》，《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
4. 杨春时：《论生态美学的主体间性》，《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5. 万书元：《生态美学的性质及其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
6. 刘精科：《国内生态美学研究综述》，《中州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
7. 罗卫平：《国内生态美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8. 陈红兵：《存在论视域中的生态哲学》，《河北学刊》，2005 年第 3 期。

9. 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10. 银建军：《中国生态美学研究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
11. 朱立元：《寻找生态美学观的存在论根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2. 汪树东：《看护大地：生态意识与郭雪波小说》，《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
13. 赵奎英：《论生态美学的困境与前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4. 陈伟：《儒家社会生态美学思想与道家自然生态美学思想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5. 王茜：《生态美学研究的困境与边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6. 盖光：《生态视阈中人的和谐生存》，《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7. 张爱凤：《中国生态美学研究近三年的新趋向》，《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8. 赵树勤、龙其林：《世界复魅：当代生态小说的美学追求》，《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9. 王俊：《论生态美学思想及当代诠释》，《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0. 李庆本：《国外生态美学状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1. 雷鸣：《当代生态小说的审美迷津》，《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
22. 刘文良：《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生态批评不可忽视的维度》，《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
23. 雷鸣：《危机寻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现代性——对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小说的一种综观》，《前沿》，2009年第9期。
24. 王艳玲：《忧郁的田园牧歌——解读张炜小说》，《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5. 刘亚利：《论新世纪生态小说的审美取向》，《小说评论》，2010年第1期。
26. 曾繁仁：《生态美学建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7. 王梦湖：《生态美学——一个时髦的伪命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8. 牛庆燕:《重建生态平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9. 党圣元:《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报》,2010年第3期。
30. 党圣元:《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3期。
31. 王平:《论李传锋动物小说审美取向流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2. 盖光:《生态审美的生态哲学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33. 隋丽:《绿色的忧思_生态小说的审美维度与价值范畴》,《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34. 李长中:《“生态写作”的不同面相——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生态书写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5. 宋俊宏:《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的回顾与反思》,《鄱阳湖学刊》,2012年第4期。
36. 夏文仙:《当代生态小说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态度——守护生态的含魅老者的形象解读》,《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37. 荀羽琨:《贾平凹小说自然生态的美学维度》,《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38. 张贺楠:《新世纪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现状》,《作家杂志》,2013年第2期。
39. 范永康:《生态美的学理依据、理论内涵和美学特征》,《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3期。
40. 黄怀璞:《生态美学的生发语境及学术困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三、学位论文:

1. 李哲:《渐行渐远的风景——世纪末田园牧歌小说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2. 周旭峰:《论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3. 高春民:《生态美学:一种新的美学形态》,新疆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4. 邹玲平:《〈瓦尔登湖〉的生态美学思想》,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5. 雷鸣:《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6. 苏晓霞:《温情的叙事 爱与美的追寻——迟子建小说的儿童书写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7. 李刘静：《论陈应松的神农架地域生态小说》，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8. 高红蕾：《生态视角下的伦理思考》，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9. 彭静：《新世纪动物生态小说主题论》，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10. 张茜：《新时期泛生态小说论》，海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11. 张丽莉：《家族文学的生态美学思想》，湖北民族学院硕士论文，2013年。

致 谢

我们已习惯感叹“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虽觉得俗气，但却真实。三年前，我以哭开始第一天学校生活的场景真的恍如昨日。三年来，我真的很感谢陈学广老师给我的帮助，陈老师的鼓励让我不再纠结一个并不美好的开始，而是尽情地享受研究生的学习生活。陈老师严谨治学的态度、深厚的理论基础、循循善诱的教导，个性豪爽的为人，真的能让人感受到“亦师亦友”的师生情。作为我的导师，在学习上，他总是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问题，并能启发我去解决问题，尤其是在本篇论文上，我的论文选题、结构、内容都离不开他的指导与启发。在生活上，他总是鼓励我要相信自己，并且每当我遇到困惑、困难时，无论工作有多忙，他都能及时给予最热心的帮助，从不推脱。在此，我再一次向陈学广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硕士三年期间，除了需要感谢我的导师，还需要感谢给予我知识与帮助的其他老师。姚文放老师的审慎博学，佴荣本老师的深厚学识，古风老师的细心严谨，苏保华老师的耐心负责，赵彦芳老师的温柔谦和，他们都让我深深敬佩与感动。遇到这些老师是我的荣幸，感谢你们在三年期间给予的点点滴滴。

同学与朋友的帮助也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谢谢其他七位同窗的陪伴，让我的课余生活多姿多彩。在这里特别要感谢我的挚友——尚冬梅，感谢她在我遇困时总会第一个出现在我的面前，感谢她对我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帮助，感谢她在本篇论文的修改中给予的帮助。

最后，我想感谢支持我读研的父母与家人，谢谢他们总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我的要求和最大可能地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港湾。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获奖情况

一、发表的论文：

1. 《语言的张力——以网络语言为例分析语言张力方式》，《中国文艺家》，2013年12月刊。
2. 《简析精神分析对文学的影响》，《西江月》，2013年第20期。
3. 《简析中西形式论的发展》，《文艺生活》，2013年第33期。
4. 《“洛阳纸贵”与“无语泪先流”——论文学鉴赏中的共鸣》，《剑南文学》，2013年第358期。
5. 《后现代语境下电视相亲节目审美取向》，《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二、所获的奖励：

1. 获得2012年度扬州大学一等奖学金。

扬州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于慧萍

签字日期：2015年6月12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扬州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于慧萍

签字日期：2015年6月12日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15年6月12日